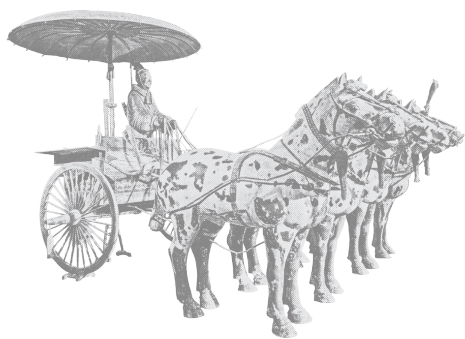


大秦 帝國 全史

传说时代至
春秋时期

唐封叶——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帝国全史 / 唐封叶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24.12

ISBN 978-7-229-17652-5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中国历史—秦代—通俗
读物 IV. ①K233.0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89184 号

大秦帝国全史

DAQIN DIGUO QUANSHI

唐封叶 著

策划编辑：李 子

责任编辑：张立武 冯世毓

责任校对：杨 婧 刘小燕

装帧设计：刘 尚

正文排版：侯 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5 字数：909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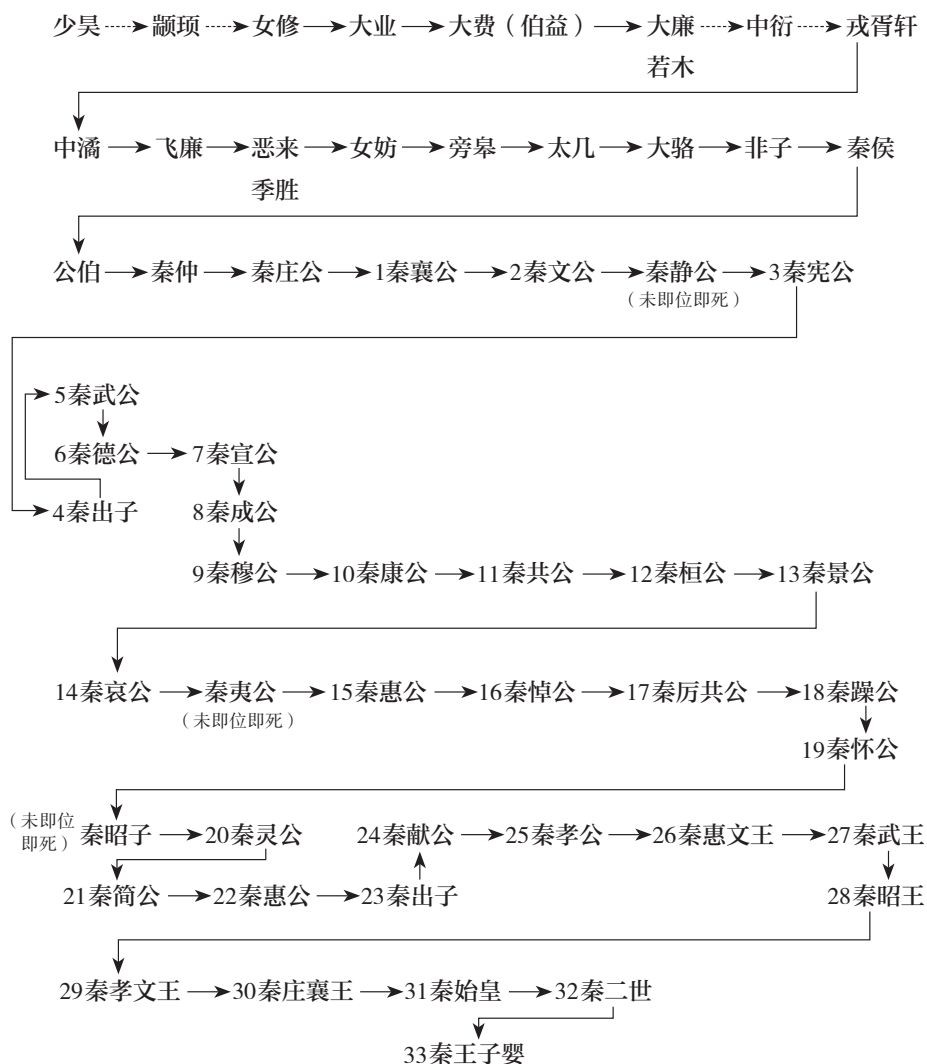
2025 年 2 月第 1 版 202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7652-5

定价：199.00 元（上中下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秦世系图

注：1. 虚线箭头表示中间世系不明；2. 上下并列的人物表示为兄弟（亲兄弟或堂兄弟）关系。



序

放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大秦帝国全史》写的是秦人从无到有，秦人族群从小到大，从建立诸侯国到一统天下，又二世而亡的历史。

秦人是传说时代夷、夏、苗三大族团中的一个起源于东方的族群，商周时期其先祖先后依附已经建立国家的商人与周人，遂崛起于西方。春秋战国时期秦人通过武力征服兼并其他族群，开疆拓土，从一个蕞尔小国扩张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王正只用短短的 13 年就并吞六国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帝国。秦人族群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完整地演绎了“部落—部族—国家—

领土国家一帝国”这一独特的中国式国家起源与发展之路，但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只维系了 15 年就迅速灭亡了。

秦人从一个小小的部族起家历经数百年最终扫平六国，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靠的是强悍的武力与野蛮的杀戮。他们缺质少文，除了石鼓文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遗存，在后来形成的汉文化中可以看到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因素与遗产，却罕见秦文化的建树。秦人究竟给后世留下了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秦帝国虽历二世而亡，但是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建立的集权专制制度却被汉王朝继承，当代学者所谓“秦制”乃是秦人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从秦至清，秦制不仅被沿用了两千多年，而且这种以皇帝独裁为特征的专制体制被发展得越来越极端。

秦王朝灭亡之后秦人融入汉人之中，从此不再独立于世。秦人没有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以外，也没有人再专门去记载秦人的历史。尽管秦始皇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却只有《汉书》与《后汉书》而没有《秦书》或《秦史》。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马非百先生以半生之力收集关于秦人的史料，于 1982 年出版了 76 万字的《秦集史》。不过严格地说，《秦集史》只是一部史料集，并非系统秦史，而且受作者写作初衷和时代限制，该书搜集的史料基本是传世史料，百余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丰富的涉秦出土资料并没有收入。

这部《大秦帝国全史》虽然是一部通俗的史书，但李阳先生的写作态度认真严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参考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金文、简帛书等新出土资料，在全面讲述秦史的同时还补充了若干文献失载的史事，订正了一些传世文献和历史研究中的讹误，一定程度上可以补秦史之缺。李阳是我的学生，我在课堂上教


秦人、秦国、秦朝历史的时候，由于课时的限制，只能讲一些线索与梗概，而他的这部书写得有血有肉，图文并茂，读他的书比听我的课更有趣味，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作为老师，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二十四史大多是由宰相领衔的史官写就，他们都是御用文人，写史自然要为朝廷服务，既要歌功颂德，又要为尊者讳。私人写史如孔子著《春秋》，因为他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也不惜使用委婉的“春秋笔法”而不敢秉笔直书。

《大秦帝国全史》一书秉持客观论史的态度，在对秦人早期颠沛流离的艰辛历程表示怜悯，对秦人质朴、勇敢、坚韧、务实的性格予以赞美，对多代秦君励精图治最终统一中国的功绩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揭露了秦文化中忽视文教、迷信武力、好大喜功、漠视人命的重大缺陷，剖析了自商鞅变法至秦朝统一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秦制”的负面作用，对秦政权统治下倍受愚弄压榨的黔首报有深切的同情，对近年来一些小说、影视剧过分拔高秦朝和美化商鞅、秦始皇等历史人物的错误倾向有一定的纠正作用，有助于读者客观公正看待那段历史。

人类的历史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史、文化史。无论中外，国家的产生都只有几千年，所以国家的历史远远短于社会史、文化史。而王朝只是占有国家的统治集团与管理机器，并不能等同于国家。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基本是王朝史，其内容主要是政治史，缺乏社会史与文化史内容。《大秦帝国全史》一书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能站在国家、人民而不是王朝、帝王将相的立场看待问题，并在书中叙述或提及了石鼓文、《诗经·秦风》中的若干篇章、战国诸子的若干主要思想、先秦至秦朝人口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水利成就等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不足之处在于，可能由于该书创作构想、主线等的限定，上述方面篇幅相对政治、军事内容依然较少。

希望今后书写秦史或其他朝代历史的人，能够将更多笔墨付诸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与人民。

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六届理事 
2024 年 5 月



写在出版之前

秦人是中国上古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朝代，“周秦之变”是中国国家形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因为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带动，秦史在 21 世纪初比较火，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三国演义》，三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肯定不会像现在一样家喻户晓。

但是文学和影视作品，出于凸显矛盾冲突、增强戏剧效果、塑造典型人物等目的，免不了会对真实的历史作若干艺术加工——虚构一些历史情节，美化或丑化一些历史人物，甚至调整历史事件的发生顺

序等。这种加工过多，倾向性过强，又会扰乱人们对历史的认知。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本人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谈论探讨“秦史”，但他们所谈论探讨的东西，很多并不见诸任何史料记载，而是小说作家或影视编剧演绎、虚构出来的。比如有人会问“秦献公为何没传位于长公子嬴虔，而是传位于仲公子嬴渠梁？”事实上公子虔在正史中只是个很普通的角色，他到底是哪位秦君的公子完全没有记载，他的“秦献公庶长子、秦孝公庶兄”的身份以及所谓赫赫军功，全都是小说家编造的，秦献公怎么可能会传位给他？又有人称赞“商鞅主动赴义，是伟大的殉道者”。但历史上真实的商鞅既没有爱民思想也根本不想殉什么“道”。他遭通缉后为了保命先是准备逃出秦国未遂，后又返回封地发动反叛，最后失败被杀，尸体被带回咸阳车裂，何曾“主动赴义”？还有人被“秦始皇命令赵佗无论中原发生什么变乱都不得回军救援”的故事感动，说他“心系华夏”。但史书中并没有相关记录，秦始皇也绝没有料到他建立的帝国会在他死后三年就覆亡。

有鉴于此，本人想写这样一部秦史：严格依据传世文献所写，并把近现代的相关出土资料如甲骨文卜辞、商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牍的内容以及重要的秦文化遗址考古情况有机融入，尽可能保证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都有出处，同时补充文献的不足、修正史书记载的谬误，帮助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相对真实的秦人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中国上古两千年从部族方国时代到封建王国时代，最终进入专制帝国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当然，为了增强可读性，避免成为“学术天书”，这部秦史的语言应是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应尽量以讲故事为主，并根据相关内容插入对应的史料文献与因考古新发现而产生的一些新观点。

于是在伏案四年后，这部内容起自传说中的女修吞卵生大业、伯益得嬴姓，终于秦朝灭亡、子婴被杀的长篇通俗秦史，得以呈现

在大家面前。在第四遍修稿时，为了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局势、地理形势和战争进程，本人还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为本书绘制历史示意图 100 多张。

希望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全面、系统、料足、有图的秦史，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以与朋友们分享一下。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书的时空跨度又比较大、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广，书中肯定有不少错漏之处，真诚欢迎方家批评斧正！

唐封叶（李阳）

2024 年 1 月

大秦帝国史

总目录

上册

传说时代至春秋时期

大秦世系图 / 1

序 / 1

写在出版之前 / 1

第一章 秦出东方 / 1

第二章 登上西周政治舞台 / 59

第三章 秦人立国 / 103

第四章 秦穆公『三置晋君』 / 167

第五章 东方不亮西方亮 / 229

第六章 春秋末段的低潮期 / 275

中册 战国时期

第七章 战国初期的挫折与探索 /343

第八章 脱胎换骨——商鞅变法 /383

第九章 大秦第一王——秦惠文王 /459

第十章 『三驾马车』的时代 /533

第十一章 远交近攻——秦昭王的风采 /613

下册 秦朝时期

第十二章 终结者的到来——秦正出世 /725

第十三章 秦王扫六合 /795

第十四章 伟绩、暴政——始皇帝的一体两面 /875

第十五章 二世而亡与千秋功罪 /985

参考资料 /1073



上册目录

大秦世系图 / 1

序 / 1

写在出版之前 / 1

第一章 秦出东方 / 1

『女修吞卵』背后的神话与史实 / 2

大业没功业 伯益立殊勋 / 11

启杀伯益——家天下代替了公天下 / 17

后羿代夏——东夷人的短暂反扑 / 23

费昌佐成汤 嬴族仕商朝 / 28

商纣王的左膀右臂 / 37

牧野之战与费仲、恶来之死 / 44

三监叛乱 飞廉殉商 / 51

第三章 秦人立国 / 103

没有烽火的西周灭亡故事 / 104

周平王『咸鱼翻身』 秦襄公立国称『公』 / 109

僭礼祭天 奉诏伐戎 / 116

秦文公迁都『汧渭之间』 / 123

陈宝与南山大梓树的神奇传说 / 130

群雄初觉醒 / 133

秦宪公的东扩历程 / 140

秦武公设县 秦德公迁雍 / 143

东周首场变法秀——管仲改革 / 150

我是蛮夷我怕谁——熊通称王 / 158

第二章 登上西周政治舞台 / 59

『谪戍』的地方叫邾圉 / 60

商周之变——从『事鬼』变『事人』 / 64

孟增受封 造父得宠 / 74

嬴姓赵氏的由来 / 77

非子邑秦——秦政权诞生记 / 83

秦仲殉难与庄公复仇 / 89

西周朝每况愈下 秦襄公未雨绸缪 / 96

第四章 秦穆公『二置晋君』 /167

首结『秦晋之好』 /168

五张羊皮换贤臣 /175

『骊姬之乱』与秦穆公『一置晋君』 /181

晋惠公赖账 /187

联手平周乱 输粮赈晋灾 /192

韩原之战 /195

秦穆公『二置晋君』 /203

秦并梁芮 /208

重耳的流亡生涯 /212

秦穆公『三置晋君』 /220

第五章 东方不亮西方亮 /229

秦穆公错失良机 晋文公获赐南阳 /230

合兵伐郤国 /235

城濮之战不是以弱胜强 /238

秦晋失和 /246

弦高犒师与穀之战 /251

三用败将 封尸峭山 /260

由余归秦 /265

『China』的由来 /269

第六章 春秋末段的低潮期 /275

失败的『四置晋君』 /276

秦康公的报复 /281

二国灭庸国 赵盾弑其君 /287

晋楚持续争霸 秦齐屡起屡仆 /294

秦桓公搅局『弭兵』遭打脸 /301

秦景公再怼晋国 /306

和平到来——『向戌弭兵』 /312

王子朝乱周 楚平王纳媳 /318

伍子胥鞭坟 秦哀公救楚 /326

两『圣人』与秦国 /334

第一章



秦出东方

“女修吞卵”背后的神话与史实

说起秦，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咸阳，想到今天的陕西省、甘肃省，想到那充满黄土高原独特韵味的秦腔，进而把秦人当作土生土长的西部人。其实嬴姓秦人虽然是从西方崛起并一统天下的，但若要追根溯源，他们的“祖籍”却不在陕甘。所以本书我们要从秦人的起源说起。

在中国，但凡是显赫的族群或有名的帝王，总会有一段关于其来历或出世的离奇神话传说，嬴姓秦人也不例外。

据《史记·秦本纪》等史料记载，嬴姓人的“老祖母”，是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zhū nǔ）氏的孙女，名叫女修。

据说有一天，当时还是姑娘的女修正在家织布，突然天上一只玄鸟（燕子）飞过，继而一个鸟蛋掉了下来，正落在她的织机上。这女修不知是饿了还是馋了，就停下织机，把那玄鸟产的小小鸟蛋捡起来吃了。没承想这玄鸟蛋可不是好吃的，很快女修姑娘的肚皮竟然就大了起来——她莫名怀孕了，但找不到孩子爹。那时没法打胎，女修只得十月怀胎把孩子生下来。女修生的这个男孩，就是嬴姓秦人的第一位男性始祖，名叫“大业”。

讲到这，有些爱读史的读者可能会说，你等等，这桥段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不错，您记性挺好，《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人始祖契（xiè）的降生故事，情节和上面几乎一模一样：《殷本纪》里说，五帝之一的帝喾，其正宫大老婆简狄，也是吞了玄鸟蛋才莫名怀孕生下了商人始祖契的，《诗经·商颂·玄鸟》里还有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唯一的区别是简狄当时正在洗澡，而不是织布。所以仿照《商颂》，我们可以为秦人的始祖诞生故事作一句诗，那就是“天

命玄鸟，降而生秦”。

吞鸟蛋会怀孕生孩子，这种离奇故事当然是神话传说，没一个现代人会真的相信，那不过是上古婚姻混乱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商、秦始皇降生的故事情节如此雷同，连吞的鸟蛋都是同一种鸟即玄鸟所生，显然暗示商人和秦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自我意识，最早肯定拥有极近的血缘关系，他们两族很可能就是从同一部落分化出来的。我们知道，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东夷各部落大都是以鸟为图腾，现代史学界多数认同商人起源于东北方（今河北或辽西），为东夷的一支。那么以此类推，与商人有着相同的“天命玄鸟”故事的嬴姓秦人也应起源于东方，最早属于“东夷大家庭”的一员。

东夷，是古代文献中对上古东方各族的泛称。广义上，东方北到幽燕，南至江淮的族群，都属于东夷；狭义的东夷，则指的是中原正东方的夷人，也就是指上古时位于现在山东一带的部族。

有人可能会问，东方之族为啥叫“夷”呢？传统的解释是说“夷”字“从大（人）从弓”，意思是东方人善于射箭，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甲骨文、金文里表示东方部族的“夷”最初写作“𠂔”，好像一个侧面视角坐着的人的形象，应该是因当时东方人常见的坐姿而得名。不过因为甲骨文、金文中的“𠂔”（夷）字和“亼”（人）字实在太像，国学大家王献唐干脆认为它们就是一个字，所以西周末期、东周之后的人们就



大汶口文化时期鸟形白陶鬲，反映了东夷人对鸟的崇拜

用另外一个字“𠂔”（夷）来代替“𠂔”了。当然“夷”字也不是西周末期人新造的字，甲骨文、金文中本有“夷”字，但作动词“平息”解，并不做族名。甲骨文、金文中的“夷”，是由“矢”和“S”组成，“矢”众所周知是箭的意思，“S”则代表箭上绑的绳子。故而“夷”字并不是“大”（人）和“弓”的组合，作为后起字也不能用它来分析东方人的得名由来。

很多人听到“夷”字可能立马联想到“野蛮”“落后”这些词，其实在上古时期，“蛮、夷、戎、狄”等词只不过是人们对不同方位的部族集团的泛称，最初并不含明显的褒贬之意。那种褒贬之意，是春秋以后随着东周王朝的衰落、四方部族入侵中原才“反弹”形成的，就像盛唐用人不问民族，而较弱的宋朝才讲“夷夏大防”一样；且现代考古已经证明，上古时期东夷地区的文明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在某些方面和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处于领先地位。

话说 8500 多年前，全球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气温大幅回升，进入长达 5000 多年的温暖期。因为温度高峰（距今 6000—5000 年）正当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 7000—5000 年），所以我国将 8500 年前至 3000 年前这段温暖期称为“仰韶温暖期”。这期间，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华北地区估计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 2~3℃，冬

季 1 月平均温度高于现代 3~5℃。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正是被这次温暖期催生的。

考古学家经过几十年发掘，已经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文化的遗存。为此已故著名考古学

苏秉琦按照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把我国新石器遗址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二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三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五是以鄱阳湖—珠三角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家苏秉琦先生摒弃了传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并被学界普遍接受。该说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不同地方各自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动交流。

包括嬴姓秦人在内的东夷人创造的新石器文化，正处于学者所说的“山东文化区”。因为山东内有泰山（岱宗），紧邻东海，所以也被称为“海岱文化区”。仰韶温暖期期间这里气候温润，湖泊众多，亚热带植被密布，泰山南边的汶河、泗水流域居然生活着现在长江流域才有的扬子鳄。

海岱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第一个文化——后李文化，时间与中原地区最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时间相当，那时东夷居民就有了原始农业。而在北辛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

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谱系

| | |
|-------|------------------|
| 后李文化 | （约 8500—7500 年前） |
| 北辛文化 | （约 7400—6400 年前） |
| 大汶口文化 | （约 6300—4600 年前） |
| 龙山文化 | （约 4600—3900 年前） |
| 岳石文化 | （约 3900—3500 年前） |

纺轮，这标志着海岱地区诞生了纺织业。自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大汶口文化开始，东夷文化全面繁荣，农业发展到已经有剩余粮食可以大量酿酒的地步，畜牧业也五畜齐全（六畜只缺马），手工业中的制陶、玉石制作、牙骨雕刻、纺织、酿酒等更是达到中国同时期文化的最高水平，一些陶器上甚至出现了原始文字——陶文；尤其是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父权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私有制也早已出现并达到贫富分化严重的地步，一些墓里随葬了玉斧、象牙雕筒、玉环等贵重器物，而一些墓里却几乎一无所有。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族群冲突加剧等原因，海岱地区的

古城大量出现，说明当时东夷人已经迈入方国或酋邦^①时代，也即很多东夷部落已经发展为准国家。东夷本原性文化中最后的岳石文化，时间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夏代中后期至商代早期）相当，那时东夷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此后随着各部族交流融合，东夷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所以历史大家徐旭生认为，华夏族就是由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三部分组成的。

东夷集团对应的考古学上的文化前面讲过了，这里再简单说一下苗蛮集团和华夏集团对应的考古文化。

一般认为苗蛮集团就是考古所说的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约 5300—4600 年前）和石家河文化（约 4500—4000 年前）；早期华夏集团就是以陕东、豫西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约 4700—4300 年前）和王湾三期文化（约 4400—3700 年前）。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带抽象花卉纹的陶器，多数学者认为这就是“华夏”一词中“华”（花）的源头。

回过头来说东夷。中国古代传说和古史中很多所谓的“圣王”，就是东夷集团的英雄。

东夷最早的英雄是太昊，又写作“太皞”，他的活动时间大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据《左传》记载，“太皞之墟”在陈，也就是说太昊的居地在今天河南东部的周口市淮阳区，其部族活动范围则包括今天的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太昊的姓是风，在甲骨文里“风”和“凤”是一个字，都是凤鸟的形象，不过史书记载他的部族却以龙为图腾，可能是因为当时豫东也有扬子鳄的缘故吧。

太昊之后，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东夷又出现一位伟大的部族首领，他就是少昊，又写作“少皞”。少昊为嬴姓，

①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基在其代表作《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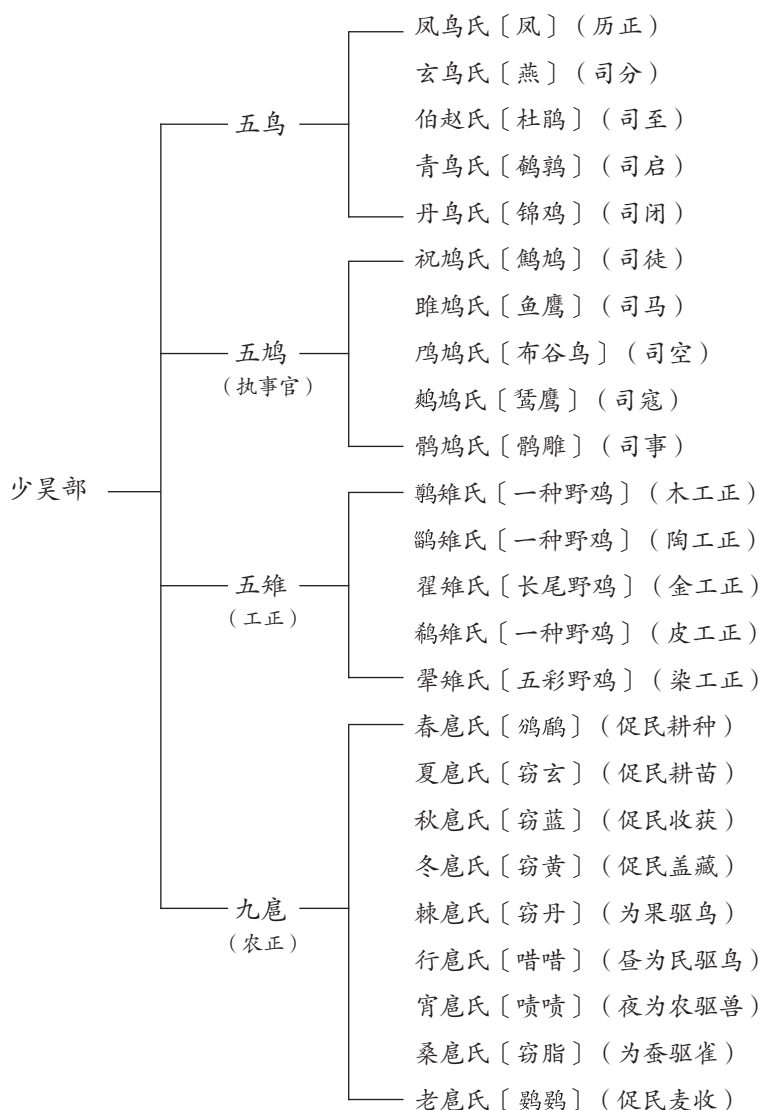
很多学者认为，“嬴”即“燕”的转音。少昊的名字叫挚，“挚”通“鸷”，就是鹰、雕之类的猛禽的意思。据《左传》记载，少昊部族下辖的“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等四部 24 个氏族全都是鸟名，他们的官职也都是用鸟名来命名。所以少昊部族就仿佛是雄鹰统领下的群鸟。

据先秦《尸子》一书记载，“少皞之墟”在穷桑，也就是现在山东曲阜。前面我们介绍过，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大汶口遗址命名的，而曲阜就在大汶口镇以南约 40 公里处。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山东中南部汶河、泗水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就是由少昊部族创造的。

那太昊、少昊是什么意思呢？先说“昊”，显而易见，它的字形就是太阳高居天上。疑古派大师顾颉刚用十分简洁形象的话语解释说，太昊就是“大太阳神”，少昊就是“小太阳神”。因为东方的夷人作为中国最早看到日出的族群，也有浓厚的太阳崇拜。有人会说，你不是说东夷人大都崇拜鸟的吗，怎么又变成崇拜太阳了？其实这二者并不相悖——在上古先民眼里，只有鸟能在天上翱翔，他们认为太阳就是由鸟背负着在天上运行的，后来又产生了太阳为“三足乌”即“踆（cūn）乌”的传说。

东夷继太昊、少昊之后的第三个著名人物，就是女修的祖先颛顼。关于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说他是黄帝的曾孙（黄帝—昌意—韩流—颛顼），《史记·五帝本纪》说他是黄帝的孙子（黄帝—昌意—颛顼）。其实颛顼是黄帝后裔的说法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后起的传说。因为黄帝本是北狄的天神，东方部族的首领自然不可能是西方神的子孙。

话说中国上古时的各个部族或方国，往往都有各自信奉的最高神，或自己的始祖神。正如最初各部族方国各自为政，这些神本来都是独立、互不牵扯的，因为各部族方国的发展有早有晚，所以往往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但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列国兼并加剧、华夏民族逐渐形成，处于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的人们，就把原先各部族



少昊氏四部 24 氏族

分别传说的神或始祖，都编到一块儿去了，把神话传说“历史化”，编成了一个所谓的“上古帝王将相神话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某些在上古时或后世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部族的神或始祖，就成了“三皇五帝”，比如西北周人的天神黄帝和周人姻亲姜姓部族的神灵炎帝的地位都十分崇高；而另一些在上古时或后世地位较低、影响较小的部族的神或始祖，就成了他们的臣子或后裔。颛顼是黄帝子孙的说法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三大集团及传说中的东夷英雄居地分布图^①

① 本书历史地图均以 <https://maps-for-free.com/> 网站的卫星图为基础绘制，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在一些古籍中，颛顼是被少昊部族养育过的，所以很多学者认为颛顼应该是少昊部族的支系。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颛顼之墟”在帝丘，也就是说颛顼的居地在今天河南濮阳。

颛顼的第一项功业是击败了强大的共工氏。《列子》和《淮南子》中有大家熟悉的神话，那就是共工氏和颛顼争夺帝位，用水来攻击颛顼，最后却惨遭失败，恼羞成怒之下，共工用头猛撞不周山，结果撑起苍天的天柱折断，系牢大地的绳索也断开。于是天倾西北，日月星辰都跑到那边；地陷东南，江河百川都向东南流淌。

当然颛顼在神话传说中最大的成就，要数所谓的“绝地天通”。据《国语·楚语》记载，上古时，有专门的巫师负责祭祀神灵、沟通天地，礼仪规范；少昊氏后期，因为九黎族作乱，管理民事的官员和管理祭祀的官员混杂不分，任谁都能随意祭祀各路神灵甚至祭天，贡品有多有少，礼仪也杂七乱八。为此登上“帝位”的颛顼进行大力整顿，命令一位叫重的官员管理祭祀，命令一位叫黎的官员管理民事，所以天地人神之间的沟通又重新变得规范有序。说白了，颛顼“绝地天通”等于是垄断了祭祀权和天意、神意的解释权，进而强化了部族首领和联盟首领的统治权。

“绝地天通”后，颛顼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理所当然地当上天下最大的巫师，所以在古代神话传说中他成为照临四方、无处不在的天

神，其神迹比黄帝还多，仅次于帝俊。

说完了颛顼我们自然该说到女修了。女修真的如《史记》描写那样，是一个只知道织布的小姑娘吗？《左传》里却有另一番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九

（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

——《大戴礼记·五帝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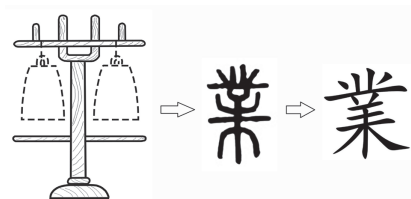
年》中记载，少昊有四位叔父——重、该、修、熙，并说修和熙组成了“玄冥”（玄武）即北方水神。注意这里提到的修。大家知道神话往往具有变异性，所以历史学家陈平认为少昊的叔父修就是《史记》所说的颛顼孙女女修。因为二者都是东夷少昊部族人，他们的名字都是“修”，他们都与“玄”有关（修又称“玄”，女修则吞了玄鸟蛋），只不过不同的传说对他（她）的辈分和性别叙述不同罢了。实际上在最初的传说中“女修”很可能本就是个男的，很多人知道近现代有个著名的革命家叫“萧楚女”，他名字里带“女”，其人却是个阳刚汉子。

当然不管哪种说法是真的，秦人的直接祖先修在传说中是出身高贵、具有神性的，这点无可置疑。修与“玄”紧密相连，说明他（她）很可能属于少昊部族四部二十四氏族中的玄鸟氏族。

大业没功业 伯益立殊勋

讲完了东夷的辉煌历史后，我们该说说女修生的儿子大业了。不过虽然《史记》中说大业是女修的儿子，但古代传说中“某某之子”往往并不一定真是母子或父子关系，也可能是“某某后代”的意思，所以我们也不要机械地认为女修和大业就是前后相继的两代人，很可能两人之间还有被遗漏的世系。

说到大业，尽管他的名字很响亮，但是因为史料残缺，他到底有什么事迹，立过什么样的大功业，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后世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本书后文简称为《说文》）中分析说：“業（‘业’的繁体字），大版也，所以饰县（悬）钟鼓。”原来“业”（業）就是指古代用来悬挂钟磬的乐器架子横梁上的装饰木板，一般



“业”字字形的由来和演变

刻成锯齿形状。“業”字上头的“业”，古文字形就像一根横木上有4个突起。所以何光岳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大业这人可能在乐器研发上有点成就，说不定乐器架子横梁上的

“業”就是他发明的，所以他才得了“大业”这个名字。

需要指出的是，可能因为大业实在没多少故事可讲，汉代以后有一些学者就说大业即是传说中五帝时期著名的刑法专家皋陶（gāo yáo），并把皋陶的功业也都算在大业头上，不少介绍秦人的现代历史读物也沿袭了这种说法。不过皋陶虽然也是少昊后裔，但是皋陶、大业其实并非同一人。首先，早期文献如先秦时期的书籍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都没提到皋陶和大业是同一个人，两人为一人的说法出现较晚；其次，古籍记载皋陶是偃姓，是英国（不是欧洲那个英国）、六国等国的祖先，而不是秦国的祖先；再次，史书明确提到皋陶居住在“少昊之墟”即山东曲阜，但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大业也住在曲阜。综上，大业和皋陶并非是一个人。


有人可能会问，那大业的居住地具体在哪里呢？考古学家邹衡、历史学家何光岳考证，它应该就在古代著名的邺城，也就是战国时期西门豹禁绝“河伯娶妻”劣习的地方、三国时期曹操的封地以及曹魏的初期都城、南北朝时期东魏和北齐的都城，即今天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城镇一带。因为大业曾经居住在那里，所以当地才有了“邺城”之名。上节介绍过，“颛顼之墟”在帝丘也即今天河南濮阳，颛顼后代大业的居地古邺城距离濮阳仅仅六七十公里；而且考古学者在古邺城以北不远的邯郸县涧沟遗址中，还发掘出黄河流域较早的水井。为什么有水井是该地为大业居地的一项证据呢？我马上会提到。

在《秦本纪》里，太史公司马迁提到的大业的一事迹，就是他

娶了少典氏部族的姑娘女华，生下了一个被称为“大费”的儿子。这里要插一句的是，这少典氏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也是个很重要的部族，传说中的五帝之首黄帝，就是出自少典氏。

不过对于大费这名字，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很陌生。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知名度要高得多，那就是“伯益”，又写作“伯翳”“柏翳”，一些史书中也单称“益”。

已故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考证说，这“益”本作“嗇”，古文写作“𪔐”，跟“燕”字极为相似，两字算是异体字的关系。原来大业的儿子“益”其实就是“燕”，也即玄鸟。之所以“益”字之前加个“伯”字，则是表示排行，或是表示他是个方国国君，如古人也常把禹称之为“伯禹”。“伯益”这名字在《国语》《史记》等书上的另一种写法“柏翳”或“伯翳”，也跟鸟有关。因为据《山海经》记载，“翳”即指五彩之鸟。总归大业的这个儿子的名字无论怎么个写法，都跟鸟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后代嘛。

伯益的居住地距离“颛顼之墟”帝丘（濮阳）也不远，在濮阳以东的河南范县一带（范县 20 世纪 60 年代前一直属于山东）。因为仍处于气象学上所说的“仰韶温暖期”（距今 8500—3000 年），如今属于黄泛区、土地盐碱化的范县一带，当时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阳光充足的一方宝地，非常适宜种植五谷。伯益一族收获了谷物后，就把谷穗放在石臼里舂捣，以取出谷粒。其他部族或方国的人见了，就把他们叫作“秦人”。因为“秦”在甲骨文里写作，就像两只手拿着一只杵，在捣下面的两棵禾（即粟）。又因为秦人最早住在今范县一带，所以当地也被叫作“秦”。据《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记载，该年鲁庄公曾在秦地修筑高台建筑，这里的秦地显然不是西方秦国之地，而是东方的范县。

这伯益在上古传说里，可是五帝后期的重要人物。传说他能靠观察岁星（即木星）的运行来推算并制定历法，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

会“占岁”；又有《吕氏春秋》《世本》等古书记载他曾经发明了挖井之法，史称“伯益作井”。前面我们提到古邳城以北不远的邳县曾发掘出黄河流域较早的水井，这也是一些学者认定古邳城是大业居地的重要根据，因为“伯益作井”肯定也是在父辈的基础上完成的嘛。不过要说伯益的首要功绩，则是辅佐大禹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伟业。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肯定都略知一二。传说帝尧时期，洪水滔天（考古、气象和水文地质资料证实4000多年前确实有一个全球性气候异常期）。帝尧采纳了四岳（即太岳，姜姓始祖）的建议，命令崇伯鲧（崇国国君名鲧）去治理洪水。可这鲧治水的方法却是一味地筑坝围堵，自然是劳而无功了。帝舜继位后，见鲧治水越治越糟，就把他流放羽山，改命其子禹治水。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发掘出著名的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多数历史学者认为它就是传说中唐尧的都城平阳，陶寺文化即尧所在的族群创造的。

那鲧和禹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什么新石器文化呢？据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属于中原文化区、由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发展而来的王湾三期文化（位于河南中南部、距今4400—3700年），可能就是鲧、禹所在部族创造的先夏文化。

古史记载，禹受命后，就带上伯益和弃（周人始祖）两个帮手，踏上了漫漫治水之路。众所周知，禹汲取父亲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那伯益和弃在治水工程中具体干什么呢？原来伯益主要负责治水大军的“开路”工作，即用“火攻”战术把治水所经之处的草木焚化、鸟兽赶跑，以方便施工；此外他还负责赈灾，把新宰杀的禽兽之肉等新鲜食品分发给灾民。至于弃，则主要负责灾区的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指导大家种植五谷。

历经十三年艰苦努力，禹在伯益和弃等人的辅佐下治水成功。事成之后，他没有像一些领导那样“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而是不忘

给好帮手伯益和弃请功。帝舜也明察秋毫，对伯益和弃予以封赏：他封弃为后稷（后是首领、君主之意，稷是农作物粟），教导老百姓种植庄稼，相当于让弃做了农业部长；他赐予伯益皂游（黑色旗帜），封为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和飞鸟百兽，相当于让伯益做了水利部长兼林牧部长。因为在传说中伯益是有“特异功能”的，作为以鸟为图腾的酋邦的首领，他能听懂鸟兽语言并与它们对话交流，所以善于驯化鸟兽。

此外，帝舜还赐予伯益“嬴”这个姓。上节介绍过，少昊即嬴姓。在帝舜时，少昊的后裔已经分很多支系。帝舜的赐姓举动，就是承认伯益一族是少昊一脉的嫡系大宗，拥有祭祀少昊的权利，可以领导少昊后裔的诸部落和方国。赐姓的同时，帝舜又将费地（今山东费县）封给伯益，古人说伯益又叫“大费”就是源于此。

当然，上古传说中的封某人于某地，其实一般都是承认既成事实，也即这块地已经被某部族或方国占有，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予以认可。因为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封（邦）建（国）制度”，要到夏商时期才显现雏形，西周才真正大规模实行并完善，本书后面会提到。具体就所谓“帝舜封伯益于费”的传说来讲，有些学者敏锐地指出，“费”古音为 bì，像极了“伯益”二字的急读发音，上古没有文字，“费”和“伯益”可能就是后世不同的文人对传说中同一发音的不同记录。所谓费地应该就是因为伯益部族在那里活动才得名，也即是地因人而得名，而非人因地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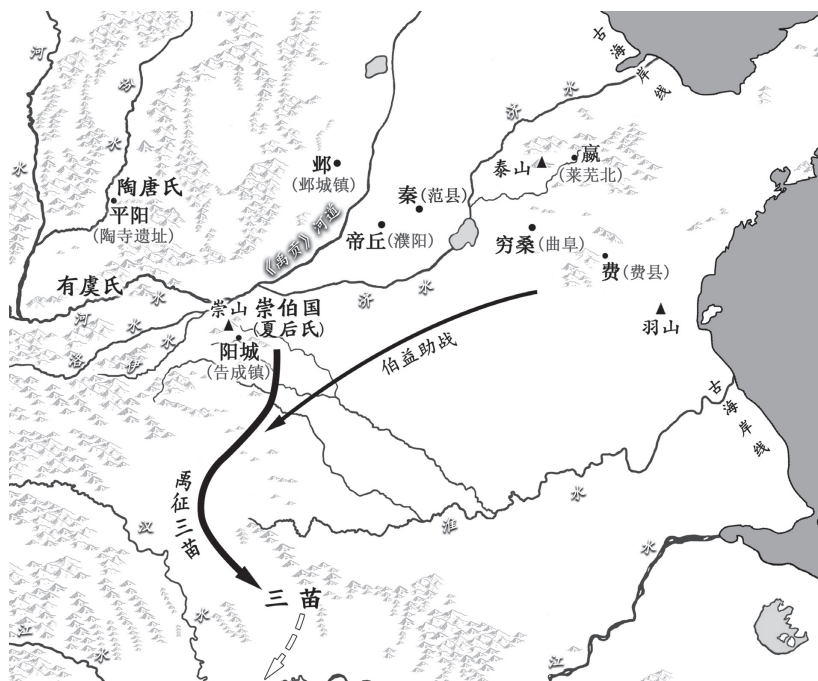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山东西部有一条发源于济南市章丘区，流经莱芜、泰安的河流，古名嬴水、现称嬴汶河，是山东汶河的三大源流之一。在莱芜还有一座古城，名叫嬴城。这嬴城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伯益一族的据点之一。那么加上秦地（河南范县）和费地（山东费县），当时伯益一族的领地应该十分广大，俨然成为东夷集团的佼佼者和代表人。

除了封官、赐姓和赐地，帝舜对伯益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把本家的姚姓美女（帝舜本身姓姚）嫁给了他。伯益与姚姓美女成亲后，连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大廉，为后世鸟俗氏的祖先；次子叫若木，为后世费氏的祖先。从若木的氏为费，我们可以知道后来费地是由伯益的二儿子若木继承了。

不久帝舜驾崩，大禹接替了他的位置，定都阳城（一般认为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成为天下共主，也即方国联盟的新首领。

大禹上位后，先是预立刑法专家皋陶为未来继承人，但皋陶年纪较大不久就去世了，于是大禹又改立伯益为继承人。在神话传说中，这期间伯益还曾协助大禹立下赫赫战功。

据战国时代的《墨子》《随巢子》等书记载，当时三苗再次反叛，



大禹、伯益居地及禹征三苗示意图

天下大乱，大禹在玄宫接受天神的命令，手持天神赐予的玉符前往征讨三苗。正当双方激烈交战、胜负难分之际，突然电闪雷鸣，有人面鸟身的大神从天而降，手持玉珪和箭矢，困住了三苗的统兵将领。见此情景三苗的军队陷入混乱，大禹乘机发动猛攻，一举大败三苗。自此以后三苗向南撤退，最终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

神话传说中人面鸟身的大神显灵扭转战局，显然是喻示现实中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在大禹征三苗的战事中立有大功。前面介绍过，大禹治水有两个得力助手——伯益与后稷（弃）。后稷是周人始祖，据《国语》说周人的图腾是天鼋，而伯益一族的图腾正是玄鸟。所以史学家杨宽考证说，这个帮助大禹大败三苗的人面鸟身的大神其实就是指大禹的亲密战友伯益。

“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也有印证。通过考古学者们发现，4000多年前，最初仅仅在几万平方公里分布的王湾三期文化（先夏文化）逐步向东、向南扩张，而豫南、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三苗文化）却日益式微，逐渐被前者取代。

启杀伯益——家天下代替了公天下

华夏集团联合东夷集团消灭了苗蛮集团后，他们两家就开始互相争斗起来。

话说大禹击败三苗后，慢慢陶醉于权力的滋味，身上的“公仆”意识逐渐淡漠，开始耍起共主的威风。如《国语·鲁语下》记载，大禹晚年在会稽山（今安徽怀远县涂山）举行诸侯大会时，有万余国国君（其实就是酋长）来朝，防风氏之国的君长仅仅因为来迟到了，就

被大禹给咔嚓掉了。同时大禹还起了私心，积极发展个人权势，尤其是暗中培养自己儿子启的势力。

另据《史记》记载，大禹正是在会稽之会后驾崩的。他死后，先由伯益代替他执政。等大禹的儿子启三年守丧期满后，谦恭的伯益就把大位让给启，自己则躲到箕山（在今河南范县西南）之南；天下诸侯也觉得伯益资历较浅，而认为启贤能，于是都舍弃伯益转而前往朝拜启。启因此代禹而立，定都阳翟（文献称在今河南禹州，一些考古学者认为即今河南新密市东刘寨镇新砦遗址），夏朝自此建立，中国历史也进入“家天下”时代。

按《史记》的说法，启接老爸大禹的班是因为天下诸侯都认同他，而不认同伯益。不过古籍《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以及上海博物馆 1998 年收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上的记载，却与《史记》大相径庭。

益于启位，启杀之。

——《古本竹书纪年》

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战国楚简《容成氏》

以上这三本书都说是启纠集同党，攻打并杀死了伯益，才夺取了天下共主之位。《史记》的记载很“和谐”，《竹书》《韩非子》和《容成氏》的记载很血腥，不过后者的说法恐怕更符合真实的历史。

说起来部落 / 方国联盟首领的推选制在上古应该一度真实存在过。比如在隋唐时期，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契丹人分为八部，契丹可汗就是由八部推选出来的，直到唐末耶律阿保机杀死其他七部首领、建号称帝才结束。由此推想，原始社会末期有“禅让制”（联盟首领推选制）

也在情理之中。但四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中原和东夷地区私有制已经完全确立，部族或方国酋长的位子也已经普遍是世袭的了。部族或方国酋长们慢慢又发现了做联盟首领的好处，自然有不少人想把这个位子据为自己和家族所有，因此开始了武力争夺联盟首领的斗争。

其实不但夏启代禹极可能是通过武力手段击败伯益，连禹代舜、舜代尧，很可能都已经有了武力因素在里面，因为《古本竹书记年》还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韩非子·说疑》也记载“舜逼尧，禹逼舜”。

前面说过学者多认为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是传说中唐尧的都城平阳。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考古人员在陶寺末期遗址发现了残酷的战争迹象：宫殿被夷平，墓葬被捣毁，城墙被废弃，还有大量人骨上明显有伤痕，甚至缺胳膊少腿没有头。这说明尧舜禹时代绝非后世儒家、墨家所盛称的黄金时代，而是一样充满冲突和杀戮。

伯益这个酋邦的酋长都被杀，那整个部族必然也遭受了重创。不过因为旧的传统的影响很大，这时依然有部族方国不服夏启破坏“公天下”的恶劣行径，大胆地公开站出来声讨，它就是有扈氏（当时位置在今河南原阳西南）。

因为司马迁在《夏本纪》的末尾提及大禹后裔的封国中有“有扈氏”，所以古人多以为这个反对夏启武力夺位的有扈氏是与夏后氏同姓的姒姓部族或方国。但这种说法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有扈氏是夏启的同族，它为什么要胳膊肘往外拐，极力反对本族人得天下呢？难道它真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以至于认理不认亲？

夏人把君主称作“后”，所以其部族被称作“夏后氏”。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历史大家顾颉刚考证认为，“扈”

的本字其实应该写作“雇”。懂点儿古文的人应该知道，“隹(zhu)”字在甲骨文里写作“𪚩”，就是一个鸟的形象；而“雇”在甲骨文里写作“𪚩”，正好像一只鸟儿飞到门户上。《说文》解释，“九雇”就是指提醒百姓农时的候鸟。所以有扈(雇)氏自然是一个崇拜鸟的部族！有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本章第一节我们介绍少昊的时候曾经说过，少昊部族中即有一个“九扈”部。因此现在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有扈氏其实是当初少昊部落的一个支系，也即东夷嬴姓方国。弄清了这点我们就明白有扈氏为什么要站出来反对夏启做“天下共主”了——原来它是在替同为嬴姓的伯益一族抱不平，要替东夷人出头反抗西夏人的统治啊！

对于夏启来说，出头的椽子当然要及时砍掉，否则这共主就做不下去了。于是他聚集拥护自己的部族方国北上讨伐嬴姓的有扈氏。有扈氏也不示弱，当即出兵迎战。

要说明的是，上古时代其实并没有常备的正式军队，部族成员都是闲时种田渔猎，战时抄家伙上阵，也即所谓的“民兵制”；那会儿

一个部族或方国的人口也很少，一般多则大几千，少则数百，能出动的男丁也就上百近千人而已，两国打仗其实就像明清时期两个村子械斗的规模。至于当时的夏后氏，如果占地100万平方米的新砦遗址真的是启的都城阳翟的话，按每户占地160平方米的标准计算，约有三万人，妥妥是当时的大国了。说完人口再说兵器，据

历史学家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对27座龙山中晚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进行研究，按每户(五口人)占地160平方米的标准推算古城中的人口，得出如下结论：“其中300人以下的城邑有5座，500~900人的城邑有5座，1000~1700人的有9座，3000人左右的有4座，4000~4500人的1座，5000人以上的有3座。……统观之，当时1000~1700人的中等城邑比较多，若均衡27座古城的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上下。”

考古研究，夏代虽然出现了青铜兵器，但数量较少。所以启伐有扈氏时，双方大多数部族战士都还是拿着石斧、石矛互砍互刺。

至于这次战争的结果，据《吕氏春秋》记载，挑起战端的夏人却没能从有扈氏那里讨到便宜，可见有扈氏的实力应该也很雄厚。于是夏启退而“修德”，实际肯定是充实军备、加强训练、联络盟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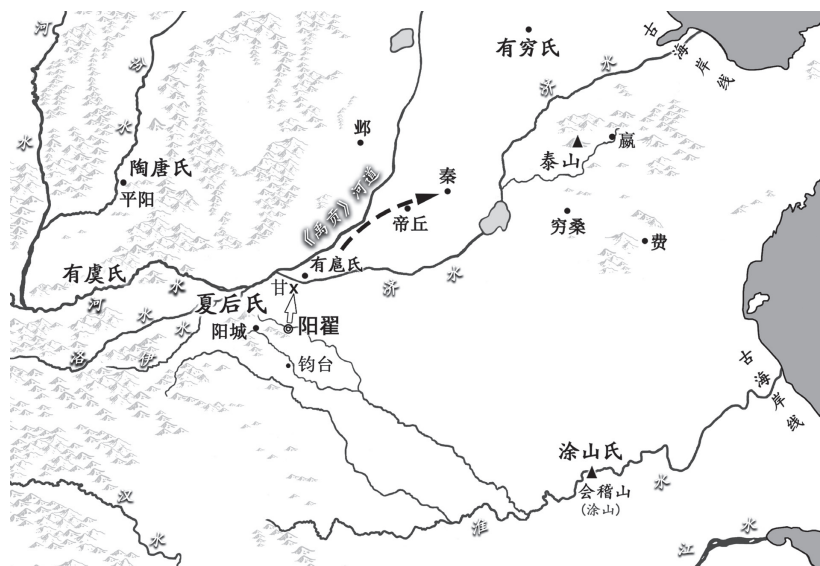
一年后，夏启再次纠集族众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今河南郑州西）。战前，夏启发表了一番措辞强硬的战前讲话来提振本方士气，他声称对方不敬老天、怠慢臣下，并严申赏罚，要求己方将士奋勇杀敌。这就是《尚书》中的《甘誓》篇。在《甘誓》篇中夏启还提醒战士注意战车的使用，不过这应该是后世的附会，因为考古证明夏代并没有人工驯养的马与马车，当时的战争形式还都是步战。

这次甘之战终于以夏启完胜告终，随后他乘胜追击，赢姓有扈氏的部分残余力量被迫向东北方向也即东夷腹地逃窜，逃到了秦地也就是今天河南范县，大约是跟伯益残部会合去了。

此战后，夏启把俘虏的有扈氏部众罚为牧奴，并让自己本家的姒姓贵族占据了原有扈氏的领地，这就是史书上所指的顾（雇）国。所以《史记》中太史公才说有扈氏（顾国）是姒姓方国，以至于后世不少人误以为甘之战是姒姓人的内斗。

强大的赢姓有扈氏几乎被夏人灭族，包括东夷诸部在内的四方部族方国无不震惊恐惧，纷纷到钧台（在今河南禹州）朝拜夏启，等于被迫承认了方国联盟首领由夏后氏君主世袭的做法。这就是著名的“钧台之享”。如此一来，“公天下”变为“家天下”，联盟首领宝座变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启所在的、原本是天下万邦之一的夏后氏也凌驾于各邦之上，成为盟主之国。

为了维持盟主地位，夏启一方面大量设置官吏，古书中散见的有“六卿”“三正”“庖正”等官职名称，史称“夏后氏官百”；另一方面他还制定刑罚、设置监狱，并建立了王室卫队这样的少量常备军



夏初会稽山位置及夏扈甘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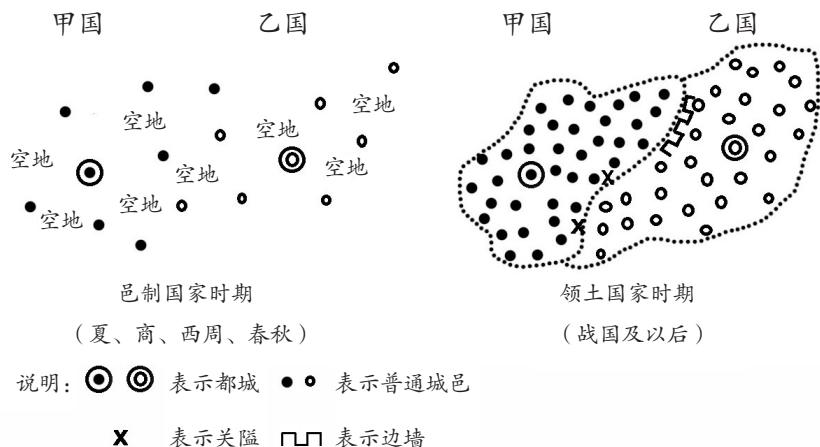
(主要由脱产的上层贵族和亲信奴隶组成)。就这样，夏后氏由酋邦方国升级转化为早期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国家的形成，并非像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一样，是一个阶级压迫其他阶级的产物，而是一个部族压迫其他部族的产物，不但夏国的建立是如此，商、周都是这样。当然大家还会发现，由于这种国家由部族发展而来，它管理社会的国家机器也都是从宗族的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同时作为盟主的夏国虽然直接管理的只有本国土地和民众，但它还通过武力征服、文化宗教吸引和吸收部族方国首领入朝为官等形式来间接统治周边各国各族，迫使他们臣服自己、纳贡服役、战时协同出兵等。于是传统上就称由凌驾各国之上的夏国及其统治下的各国各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为夏朝。

后羿代夏——东夷人的短暂反扑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开国之君夏启在位三十九年驾崩，随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把都城由阳翟迁往斟鄩（zh n xún）。现在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即史书中的夏都斟鄩。

但太康这个人，本事赶不上父亲万分之一，还不理政事，天天沉迷于游玩打猎。这时东夷有穷氏的国君后羿（“后”也是君主之意），趁太康某次一连百日在外打猎、国都空虚，采取“掏心战术”发动了对夏朝的突袭，一举占领了斟鄩，把太康挡在外面不让他回来。太康进不了国都，只得逃到阳夏（夏音 ji，今河南太康县），最后死在那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太康”的地名。因为根基不稳，夺取夏政权的后羿先是立太康的弟弟仲康做傀儡。等仲康死后，感觉权力已经巩固的他赶走了仲康的儿子相，正式夺取了夏人的天下共主位子。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后羿代夏”。“后羿代夏”是自夏启攻杀伯益、驱逐有扈氏以来东夷人对夏人的重大胜利。

有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一个王朝的都城一下子就被拿下？其实这是因为上古地广人稀，国家规模很小，大国也就是几座城邑（包含城池本身和外围一圈的附属村落及田野），小国甚至只有一座城邑，大国的几个城邑之间、各国之间都是大片空地，所以敌军可以通行无阻，直达要攻击国家的都城。直到春秋时期，随着人口繁衍、城邑增多，人们才初步产生领土意识，开始在少数边疆要地驻兵设防，但整体守卫工作还很松弛；要到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城邑连成片、各国间的空地消失，才沿边境线全面设防甚至修筑长城。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战国以后的国家叫作“领土国家”，而把战国之前的国家称作“邑制国家”。也就是说三代时期人们只有据点（邑）的概念，国土即各个据点，



据点之外的空地不是国土。

回过头来说后羿。有道是“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英雄一时的后羿拥有天下后，仗着其天下无敌的高超射术，觉得无人可以撼动其统治，也逐渐变得和他打败的太康一样，成天游玩打猎，整日不沾王宫。因此他的宠臣寒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袭杀了后羿并霸占了他的妻子纯狐，还和纯狐生了浇和豷（yì）这两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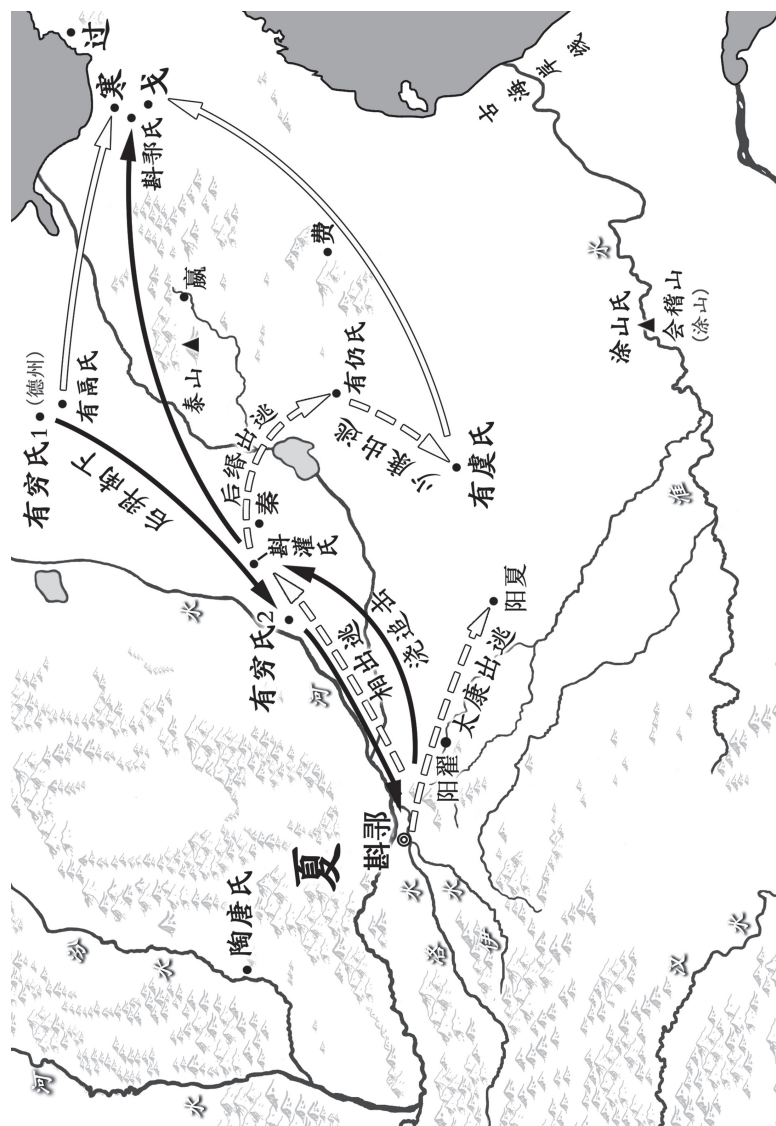
再说夏人那边。相被赶出斟郢后向东逃亡，企图依附同为姒姓的斟灌氏（在今河南清丰县南）。十几年后寒浞为斩草除根，派以力大勇武著称于世的儿子浇剿灭了斟灌氏和斟郢氏（在今山东潍坊市市区），并杀掉了相。此后寒浞衣锦还乡，回到老家寒国（在今山东潍坊市东北）居住，又把儿子浇封在过国、把儿子豷封在戈国，作为自己的屏障。好在相死前他的妻子后缙已经有了身孕，她在浇攻打斟灌氏的混战中侥幸从后墙的狗洞爬出，逃回了自己的娘家有仍氏（即风姓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市），生下了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他的外公见他闲着没事干，就让他当牧正去管放牧牛羊。浇听说夏朝还有直系后裔在，又想袭击有仍氏杀掉少康，少康不得不再次逃到舜的后裔有虞氏

之国。有虞氏君主对落难的少康不薄，不但按他特长任命他为庖正（御厨厨师长），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给他一小块封地。少康于是“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也就是获得十里的田地、五百壮丁的部众。

生活虽然暂时又安定下来，但还在娘胎里就开始饱受磨难 of 少康明白，有些事躲避是躲避不掉的，要想真正过安生日子，只有消灭掉敌人。因此他广施仁德，聚拢人心，最终在岳父家有虞氏和夏人遗民有鬲氏等各部族的支持下发动反攻，杀死了寒浞和他的两个儿子浇和豷，报了家仇国恨，恢复了姒姓夏朝的江山，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少康中兴”。“少康中兴”距离“后羿代夏”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是夷夏斗争的又一次转折。

另一方面，从东夷一方来说，后羿—寒浞集团被夏人消灭，使东夷人遭到沉重打击。考古发现，原本在同时期中国各类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山东龙山文化（约 4600—3900 年前），突然在距今 3900 年前衰落。后起的岳石文化（约 3900—3500 年前），其陶器等制作技艺反而比龙山文化时期大幅后退。因此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这种文化倒退就与少康复国时对东夷的反攻倒算有直接关系：浇、豷等人被杀时，一些东夷部族或被消灭或被强迫迁徙到中原，原东夷地区人口大减，空余出来的地理空间被不知从何处来的更为落后的部族占领，导致了山东地区文化的后退。相比创造山东龙山文化的“老东夷人”，笔者认为可以把这些创造了较落后的岳石文化的族群称为“新东夷人”。这也证明“新”并不是都胜过“老”，反映了历史的曲折性。

少康之后，历代夏人君主仍不断东征东夷，屡遭失败的东夷人没能再次上演翻盘大戏，此后四百年间多数老东夷部族方国都接受了夏人的统治，并逐渐与夏人融为一体。这时期，考古学上所说的其他文化也相继衰落，各地区文化相互竞争、争奇斗艳的“满天星斗”时期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轮明月当空照”的“月明星稀”时期，也即形成了中原二里头文化一家独大、其他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的局面，



后羿代夏、少康中兴中康

中国以西的文明

公元前 9000 年—公元前 8000 年，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人们相继种植了大麦、小麦；公元前 4000 年，他们发明了犁，并开始利用驴和牛耕地。

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埃及和两河流域分别出现象形文字，到公元前 3000 年前后，发展为成体系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家自公元前 3000 年开始，新君上任都会颁布成文法典。

公元前 4500 年，今天欧洲东南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率先出现了锡青铜；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500 年前后，两河流域出现青铜器，从此以后两河流域居民开始普遍用青铜制造斧、锯、刀、剑等工具和武器，到古巴比伦王国时期青铜器大量涌现。

奠定了中原文明的最终强势地位。

那么以夏人为代表的中原文明为何会击败东夷等其他文明呢？这应该与中原的地理情况有直接关系：一、中原水土环境适中，比北方湿润，全球气候变化时又不像东南沿海那样经常遭受海平面起落之苦（如学者认为著名的良渚文化的衰落就与海平面上升有关）；二、中原处于各文化的中心位置，方便吸取各文化的精华，尤其是容易吸取外来的西方文明。

回过头再说我们本书的主角——秦人的直系祖先伯益部族。伯益死后，因部族受到重创，他的后代流散四方。有关伯益后代在夏朝的史事，史书上缺乏记载，看样子他们受到夏人的打压，混得并不如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老东夷部族都甘愿臣服于夏人的脚下，仍有一些东夷人宁可远迁，也不向夏人低头。原来居住在东方犬丘（又名垂，今山东鄆城东南）的吠夷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约在夏朝中期，吠夷一路向西迁徙，先进入现在的陕西关中地区，在今天兴平市东南居住过一段时间，留下了一个“犬丘”的地名；随后他们又踏上征程，继续向西进发，越过了陇山（六盘山），进入

今天甘肃礼县一带并长期生活，又在当地留下了“西犬丘”的地名。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到夏朝末代夏后桀在位时期，吠夷不知为何调头再次进入关中，居住在豳地（今陕西彬县）和岐山之间。

吠夷要算是传世文献中最早西迁的一支东夷人了，他们大无畏长途远征的气概不由得让人钦佩。一些学者认为吠夷很可能就是后世所说的犬戎。不过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提到这吠夷呢？看到以后的章节，大家自然就会明白。

费昌佐成汤 嬴族仕商朝

伯益族人再次出现在史书上，已经到夏朝末年了。

末代夏后桀，日名为帝癸。日名起源于夏代、盛行于商代，是以天干字（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称呼君王贵族的一种方式，当代学者多认为该天干字表示由占卜确定的下葬日或祭祀日。在史书中，帝癸即桀具备一切亡国之君的特质。

据《竹书纪年》《尸子》等书记载，夏桀上台不久各地就发生地震，连夏朝宫室之一的容台都给震塌了。地震又导致干旱等次生灾害，夏朝核心区域内的伊水和洛水一度断流。不过夏桀却不理天象示警，不顾百姓死活，立即征调民夫又修筑了更高大壮观的倾宫和用美玉装饰的瑶台供他玩乐。

要尽情享受挥霍，当然得大肆聚敛财富。夏朝的生产力还比较低，又逢灾年，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无不大骂夏桀。夏桀却不以为意，仍旧自比为光芒万丈、照耀大地的太阳。老百姓听说更怒了，恨恨地说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意思是你这太阳什么时候完蛋，

我们情愿和你一起灭亡！

夏桀却仍不知悔改，一味用武力来维持统治，并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战争。他先是攻打东方的有施氏（在今山东蒙阴县南），得到了美女妹（mò）喜，对她千般宠爱。后来他在有仍氏（在今山东济宁市）召开诸侯大会时，因有缙氏（在今山东金乡县）国君中途退场，他又对其大加讨伐，有缙氏被迫献上琬、琰两个美女才逃过一劫。夏桀喜新厌旧，有了新人，就把妹喜冷落到一边，天天跟那姊妹花厮混。为了讨美人欢心，他在横征暴敛上更是变本加厉，至于朝政，自然是抛到九霄云外。

眼见夏桀昏庸残暴，诸侯纷纷叛夏。有个叫关龙逢（páng）的大臣向夏桀直言进谏，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他杀了。

就在夏桀众叛亲离、夏朝统治日益衰败的时候，东方有一个夷族小国却逐渐兴起，这就是商。

在本书开篇，我们已经介绍了《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人起源神话。在《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还说商人“老祖母”简狄是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妃子，商人始祖契是帝喾的儿子。帝喾其实也是东夷集团传说中的上古英雄，在神话谱系中他位于颛顼之后、尧舜之前。而在殷墟卜辞里，人们发现商人隆重祭祀一个叫“高祖夔”的始祖，一些历史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杨宽、袁珂等均认为“高祖夔”就是传说中的帝喾，也即《山海经》中的第一大神帝俊。

根据考古研究，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位于今天河北西南部、太行山东麓的下七垣文化即商人文化。不过因为早期商人的经济形态尚处在游牧和“刀耕火种”的游耕阶段，所以他们的部族一直迁徙不断，几百年间大概从北往南迁了七个地方。到了夏朝末年，契的第十四代孙成汤（殷墟甲骨文里称其为“成”或“唐”，死后日名为“大乙”）带领族人进行第八次迁徙，迁居到中原的亳（一说在今河南内黄、濮阳一带）这个地方。与夏人最高首领称“后”不同，商人最高首领是

称“王”的。在甲骨文里，“𠩺”（王）就像是一把大钺或大斧头。

最初商王成汤的辖地仅七十里，但见夏桀无道，他有了取而代之的心思。他首先广施仁德，招贤纳士，以争取四方各国各族的支持。

《吕氏春秋》记载，成汤有一次到野外去，看到有个人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布了四张大网来抓鸟，布置完之后他还祷告：“天上的、地下的、四方的鸟儿都进我网里来啊！”

成汤一听，连忙说：“这哪行啊，这不是把鸟抓绝户了吗？只有夏桀才会这样干！”于是他命令捕鸟人把网撤去三面只留一面。

成汤“网开三面”的故事传开后，诸侯都说他是个大大的仁君，先后有四十余国前来归附。

成汤当时还和与夏朝同姓的有莘氏（在今山东曹县西北）通婚，无意中得到了一名极富传奇色彩的贤臣——有莘氏的庖正伊尹。伊尹归商后，曾多次作为间谍替成汤到夏都斟鄩去打探虚实，居然跟被夏桀冷落的怨妇妹喜搭上线，获得了很多夏朝内部的情报。

当然，因为亳地正处在西夏和东夷之间，商人本身又是东夷的一支，所以成汤十分重视争取东夷诸国。他的左相仲虺（hu），就是东夷太昊之后、风姓中分化出来的任姓薛国的国君。

经过多年经营，成汤在伊尹的谋划下，开始实施兼并扩张和翦除夏朝羽翼的战略计划，先后攻灭了葛国、有洛氏、缗国等国，最后拔掉了夏朝的三大支柱——豕韦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姒姓有扈氏，今河南原阳西南）和昆吾国（今河南新郑）。夏桀大惊，命令东夷诸国讨伐成汤，但却无人奉诏。

人心向背已明，成汤于是在景亳（即亳）召开大会，宣布天命归商，公开竖起反夏大旗，据说前来捧场、会盟的诸侯达到三千，当然其中基本都是东夷诸侯。“景亳之会”标志着商夷联盟正式形成。

夏商实力此消彼长，而且斗争公开明朗化，世人都明白天可能要变了，重新选边站队的时候到了。这时伯益二儿子若木的后裔、费国

国君费伯昌正在夏朝为官，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

从血缘、文化上讲，伯益之族和商人应该都是东夷玄鸟氏的后裔，一千年前本是一家，费昌当然天然地对商人有亲近感。不过政治人物考虑问题不能过于感情用事，必须得立足现实，尤其是费昌的这次决策将决定本族未来的荣辱甚至存亡，不得不慎之又慎。那时商人虽然崛起，但正所谓“百年之树枯而不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朝作为立国达四百多年的大国仍然拥有较强的实力。夏商斗争到底谁能胜出，事前人们还难以判断。所以费昌迟迟做不了决断。

据东汉王充《论衡》和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最终还是一次异常天象让费昌决定选择投商：

夏桀的时候，有一次费昌来到黄河边上，居然看见了两个太阳——东边那个光华闪耀，即将升起；西边那个日益下沉，并伴有轰隆的响声。费昌于是请教河伯冯夷：“这两个太阳，哪个代表夏，哪个代表商啊？”冯夷回答：“西边的代表夏，东边的代表商。”于是费昌带领族人投奔了商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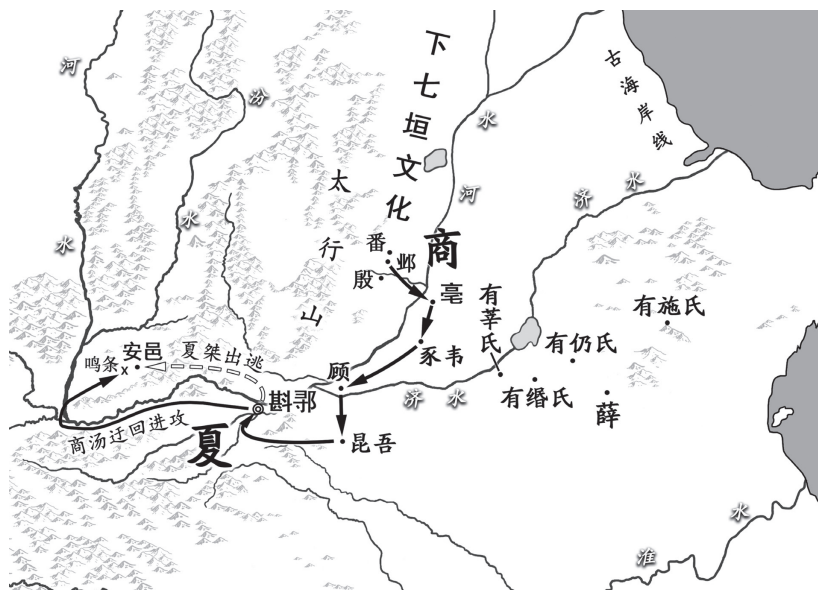
——《博物志·卷七 异闻》

东汉、西晋距离夏末足有一千好几百年（按夏朝结束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计算），王充和张华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后世衍生的神话传说。真实的历史上费昌应该是综合对比了当时夏商及其“盟友圈”的力量，才做了如此抉择。

景亳之会后不久，商王成汤率领商夷联军讨伐夏桀，这其中就包括了费昌率领的伯益子孙。见夏桀的兵力都在夏都斟郛的东方布防，成汤兵行险着，出其不意地从小道直插到斟郛的西南后方。夏桀猝不及防，慌乱之下他被迫放弃了已经三面受敌的斟郛，北渡黄河暂避到夏人势力同样雄厚且地势较为复杂的今天晋南地区，最后躲进了夏人

陪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成汤率领伐商联军迂回进攻，退无可退的夏桀集中全部兵力在安邑西边的鸣条迎战，夏商对决的终极时刻到了。

据《史记》记载，在鸣条之战中，成汤任命费昌担任了自己御车



商汤伐夏示意图

马拉战车的起源

约 6000 年前，野马在今天欧亚草原西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南部）被古印欧人驯化为家马；约 5500 年前，车在今天西亚两河流域出现；约 4000 年前，马与车结合的马车在上述两地相继出现。2019 年，中国考古人员在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周口淮阳区平粮台古城遗址发现轮距约 0.8 米、距今至少 4200 年的双轮车辙。中国马车实物最早见于殷墟车马坑，殷墟一期卜辞中也有马车的记录。因此也许夏末商初出现了少量马车但未被发现，也许当时尚未有马车和车战。如果是后者，那商汤用战车攻打夏桀的说法就是后世附会的了。

的驭手。有读者可能觉得“司机”地位卑微，费昌的职务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能当领导司机、左右领导安全的人，那必须十分了得：这一方面说明费昌继承了“善训鸟兽”的祖业，驭马驾车本领超群，技术上绝对过硬；另一方面更说明费昌已经赢得成汤的高度信任和赏识，“政治”上绝对过硬。

《墨子·明鬼下》记载，鸣条大战打响后，成汤把亲军的九辆战车摆成“人”字形的雁行阵势，带头从高地冲下直取夏桀。夏军阵势瞬时被撞开，陷入混乱之中。费昌驾车载着成汤乘胜追击，攻入安邑的近郊，成汤亲手将夏桀驾前的勇士推哆、大戏擒住。夏桀见大势已去，不得不狼狈逃窜，后来死在南巢。

随后成汤一鼓作气，又扫清了夏人的残余力量，并于原夏都斟鄩附近修筑新都西亳（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偃师商城遗址）加以镇抚。商人最终取代夏人成为“天下共主”，商国领导的国家联盟也因此升级为商朝。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商汤革命”。古人所说的“革命”，本是指革掉前朝的天命的意。

要指出的是，商人多数时间和夏人一样，还只是天下万邦中的盟主、霸主而已。虽然商人直接统治的地域、人口相对大了很多，但当时天下绝大多数方国或部族都是原本就存在的旧国旧族，它们基本都是按原来的习俗自治的，商人对它们的管理手段有限，基本是宗教、战争、婚姻、结盟等，管控力度也较小，所以它们对商人是时服时叛。

商人坐天下后，在鸣条之战中立有大功的费昌自然成了“开国元勋”，东夷嬴姓人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很多嬴姓部族借此机会迁徙到了中原乃至西方之地，广泛开枝散叶。说到底，这都是因为费昌在夏商斗争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可见抉择的重要性。

到了商朝第九任君主太戊在位的时候，伯益大儿子大廉的后代孟戏、中衍（y n）也得到赏识，都做了商王御车的“司机”，看样子嬴族人在驯化动物、驭马驾车方面确实有祖传的秘诀。商王太戊这大

领导非常关心属下，还赐予他们美女帮他们成了家。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上记载孟戏、中衍的形象都是“鸟身人言”，说得好像他们是两只会说人话的鸟儿一样。人当然不可能真的长成一副“鸟样”，这其实还是在表示他们家族的图腾是神鸟。也许孟戏、中衍都曾在本族的祭祀活动中穿上过羽衣装扮成图腾神鸟，所以后世人就对他们描述成人面鸟身的怪模样了。

自中衍之后，嬴姓在商朝代代都颇有功绩，所以地位日渐高贵，不少人成为一方诸侯。据记载，商代嬴姓之国除了费国外，还有徐国、郟国、黄国、江国、葛国等国。

商朝前期，政局比较稳固。但气象研究显示，从公元前 1500 年开始，气温逐渐降低，进入了持续约两百年的“中商冷期”。而恰好《史记》也记载，从太戊之子仲丁开始，因为王位继承制度不明确（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王室内部经常爆发王位争夺战，造成一连九世（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的大混乱，史称“九世之乱”。据文献记载，九世之乱中商朝先后迁了四次都，分别为隰（今河南郑州）、相（今河南内黄）、邢（今河北邢台）、奄（今山东曲阜）四个地方。迁都的原因，一方面应该是武力夺位的新商王想避开上一王势力较大的旧都，另一方面肯定与气候的变化导致的水旱灾害有关。直到公元前 1300 年前后，第十九任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商人的都城才固定下来，商朝的国势又重新振兴。除了后期商朝制度逐步健全、几代商王励精图治，商人中兴背后另有“天助”——原来气象研究显示，此时气温又变得温暖，并持续近三百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将之称为“殷墟暖期”。

19 世纪末，人们发现安阳小屯村出土的中药龙骨上有字，殷墟甲骨文卜辞自此出世。卜辞上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我们之前几个章节讲述的三皇五帝时代和夏朝、商前期的故事，其实都是人们口耳相传的传说，到商后期、周代乃至汉晋时

期才形成文字记录的。比如前面介绍的成汤“网开三面”的仁德故事，就是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一书最早记载的，实际上卜辞中根本找不到带“心”的“德”字，显示商人压根没有后世的仁德思想。通过研究卜辞及发掘殷墟的墓葬、祭祀坑等人们发现，商人不但如传世文献所说“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一个极其迷信

鬼神的民族，几乎事事都要求神问卜，而且动辄大规模杀人、杀牲祭祀，贵族墓葬中普遍都使用很多人殉，极其血腥残酷。所以商朝本质上是一个靠神权、巫术进行神秘恐怖统治的政权，成汤灭夏前虽然会采取措施拉拢其他国家，但他的“仁君”形象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后世儒家编造出来的。

据卜辞和早期文献《尚书》记载，商代中后期已经有了“侯、甸、男、卫、子、伯”等称号，学者认为其中很多应该是由商王外派的具有军事或其他功能的驻点发展而来的诸侯爵号。比如“𠂔”（侯）在甲骨文中像一支箭射到箭靶上，本是指派到王畿周边为商王担任“斥候”（侦察）任务的武官；“𠂔”（男），像用耒（lǐ，犁的前身）在田里耕种，又写作“任”，本是指派到外地为商王管理农业耕种的官员。当然在商朝的各邦国中，由商王分封子弟功臣建立的国家还比较稀少，而且也没有文献或考古资料可以证实商朝的分封有什么规范制度。所以说商朝的封建制度还是比较原始和初级的，并没有大规模集中分封，也没有形成诸侯的系统性。

人性与人殉的区别

人性是指祭祀鬼神、祖先时作为祭品杀死的人，当作人性的人，一般是外族的战俘、奴隶。人殉是指贵族死后用人作为其殉葬的习俗，殉葬的人一般是贵族的近亲、近臣、近侍等，他们有一定地位，往往被埋在较为靠近墓主的位置。贵族下葬及后世祭祖时有祭祀活动，因而也会杀人性，但人性都埋在墓葬的外围。人性和人殉现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以殷商时期最为盛行。

在外服诸侯称号增多的时候，商朝内服官员的称号也大大扩展，卜辞和文献中有尹、多尹、师、太师、少师、史、小臣、多射、多马、亚、多亚等，显然其内部分工相对夏朝更加细密，说明国家机构逐渐从简单向复杂发展。

在研究殷墟卜辞的过程中，历史和文字学家们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叫“𠄎”的族群。𠄎族的首领最早被称作“𠄎子”“小臣𠄎”，后期又有“亚𠄎”称呼。在卜辞中，商王的近臣被称为“小臣”，虽然官职不大，但是因为接近权力中心，所以权力不小，就如同后世帝王的近侍一般；在卜辞和传世文献里，“亚”的职能与军事紧密相关，同时也掌管祭祀，地位异常崇高，拥有自己的领地和民众。所以可知𠄎族在商朝地位比较显赫。

在卜辞中，𠄎族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从殷墟早期到晚期，共有400多片卜辞提到它。𠄎族首领不但参加商王的祭祀活动，为商王出使并巡视地方，还陪同商王到各地打猎，替商王开垦田地；尤其要重点指出的是，𠄎族武装是商王一支可靠的劲旅，经常替商王征讨东、西、南、北的各方国，如卜辞中较有名的羌方、土方、舌（qióng）方、召方、人方、方族等，都被𠄎族打了一个遍。𠄎族如此忙碌，可见它是多么受重用。商王对它也很关心，卜辞中常有卜问𠄎地是否有灾害、是否有“丧众”（族众损失）以及𠄎子是否有疾病的记录。

这个𠄎族到底是什么族群呢？学者考证，原来“𠄎”字在早期卜辞中常写作“𠄎”，后来繁化才在上面加了个声旁“匕”。文字学家们大多认为“𠄎”即是“畢”（毕）的初字，像长杆头上戴个网兜，是用来捕捉鸟兽的器具。“𠄎”上加个声旁“匕”还是“畢”（毕）字，因为甲骨文字体还没有定型，同一个字经常有繁简几种写法。我们知道，伯益的封国是“费国”，上古汉语没有清唇音只有浊唇音，声母f一般读b，所以“费”古时读bì，可见“𠄎”与“费”同音！而且我们一再讲述，伯益之族是以善于驯化鸟兽著称的，要驯化

自然先要抓到它们，恐怕要用到“畢”（毕）这种捕捉鸟兽的长杆网兜。故而以历史学家丁山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畢族实际就是伯益之后的费国之人！很可能伯益的封国



《甲骨文合集》（编号 26）

丁未卜，争贞：勿令畢以众伐（舌）

最初是写作“畢（毕）国”的，后来同音通假才写作了“费国”。这种情况在古时也是有的，比如周代北方的燕国，金文里实际是写作“匱国”或“鄩国”的，而汉代以后文献里却写作“燕国”。卜辞显示畢族在商代备受商王重用，也与史书上说的伯益之后在商朝屡立功劳、地位显贵相符合。

商纣王的左膀右臂

斗转星移，一晃又是几百年过去，时间到了商朝末期。这时持续约五千五百年的“仰韶温暖期”终于结束，气温再度突变，变得干旱寒冷起来，从此以后中国中原地区基本再未出现亚热带气候环境。而气候的变化，使得不少地方变得不再宜居，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族群不得不向适合生存的地方迁徙，从而加剧了各族群之间的冲突。所

以天下又到了大乱和“洗牌”的时候。

据《史记》记载，这时中衍的后代戎胥轩居住在西戎地区，娶了骊戎之女，生下了一个叫中湫（jué）的儿子。这里要注意“戎胥轩”这个名字：其中的“戎”并非是“戎狄”的“戎”，而是“兵车”的意思。翻看过《诗经》的读者应会记得《秦风》中有一首诗就名为《小戎》；其中的“轩”，就是指车辕。可见嬴姓后裔念念不忘自己的驾车老本行。

蒙文通、顾颉刚两位史学大家还曾考证，骊戎最早并不在今天陕西骊山，而在现在晋东南析城、王屋两山之间。另外古时在今天山西临汾市境内有一条河流叫湫水，很可能跟中湫的名字有关。所以戎胥轩、中湫所待的所谓西戎地区，也应在现在晋南一带。

话说中湫长大后同样颇有才干，因此被商王（大约是商朝倒数第二任君王帝乙）封在商朝王畿的西部边陲，也就是今天山西省南部的霍太山一带，替商朝抵抗戎狄、保卫西部边疆。后来中湫也娶妻生子，并给儿子取名为飞廉（又写作“蜚廉”），取字为处父。这飞廉的本事与祖先一样，都善于驾车，车子开起来如风驰电掣，因此后世都传说他是“风神”，还说 he 是一副鸟头鹿身的古怪模样。飞廉时期嬴姓族人又向南发展，据南宋《路史》记载，在今天山西河津市、闻喜县均有飞廉城。飞廉成家后，生下个儿子名革，字恶来。恶来力大无穷，传说他能空手搏虎兕，是古代有名的大力士，后世常用他的名字做勇士的代称。如《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就借曹操之口，称誉猛将典韦为“古之恶来”。此外恶来还有个和他强壮体魄不相称的“特长”，那就是他的嘴像八婆一样，特会说人坏话。

在商末，费昌的子孙中也有一个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那就是费仲，看过《封神演义》小说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奸臣”。《史记》曾言费仲这人嘴巴也很厉害，不过他是精于阿谀奉承；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贪财好利，也精于搜刮钱财。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费仲是个文弱的文官，因为在战国之前中国文职武职

并没有严格区分，官员都是平时管理民事，战时统兵打仗。在《墨子·明鬼下》中，费仲是与恶来、崇侯虎（崇国诸侯名虎）并列的“有勇力之人”，可见他同样是个猛将的角色。

末代商王本名受，《尚书》中称他为“商王受”；上古“受”“纣”音近形近可通假，故又写作“商王纣”（如《逸周书》）。稍晚一些古籍抄写颠倒写成“商纣王”，导致后世一些注家误把“纣”当做恶谥。

与飞廉父子和费仲同时代的商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纣王（严格讲应写作“商王纣”），即死后日名为帝辛的那位了。

史书记载，纣王这人脑瓜子非常聪明，力气大得能徒手跟猛兽搏斗。当年他即位之初，也摆出一副“任人唯贤”的面孔，任用有贤明之声的鬼侯、鄂侯（邶侯）和周侯昌（后来的周文王）做了朝廷三公。可很快人们就发现，纣王此举不过是做做样子、拉拢强藩代表而已，他的本性不久即暴露出来：他喜欢喝美酒佳酿，爱好听淫词浪曲，宠爱妃子妲己，还在都城周围的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境内）等地大建离宫别馆，并弄出“酒池肉林”。上面不过是他私生活方面，在军政大事方面，纣王也有很多重磅举措：

其一，他改革祭祀，国家祭典不再列入非商王的其他祖先和天帝、自然神；

其二，他加强王权，排挤旧有的世家大贵族（第一条即为此做铺垫）；

其三，他违反当时的“社会规矩”，执行收容逃奴政策，而不是把逃奴还给旧主人；

其四，他穷兵黩武，不断发动对东夷诸国的战争，向东扩大疆域，掠夺东方的人口、海盐等资源。

有人会有疑问了，成汤不是和东夷建立联盟才灭掉夏朝的吗，纣王怎么又和东夷打起仗来了？原来商朝前期，商夷关系总体确实不错。

但是从商朝中期开始，双方出于利益纠葛，说白了就是争地盘，关系逐渐恶化，开始刀兵不断。纣王的曾祖武乙、祖父文丁、父亲帝乙时期，商人主要对商朝西、北、南方向的敌人羌人、方族、召方、孟国等部族方国作战。纣王继位后，上述敌人都已经被严重削弱或暂时解决，于是纣王这时可以腾出手来，将商人的主要打击方向改为东方。文献和卜辞显示，纣王时期与东夷的战争，可以说是商朝与东夷数百年战争的最高潮。

回过头来说纣王的用人。纣王这样能力超群、刚愎自用的君主，自然不喜欢正直的、整天爱在自己耳边叨叨的大臣，他想要的是能无条件听从指挥命令、能给自己搞钱、能让自己玩得好、能帮自己摆脱进谏者的人。于是飞廉、恶来父子和费仲这三位嬴姓的“能人”，就进入他的视野，并很快成为他的宠臣、亲信：他让费仲给自己理财，抓钱袋子；他经常派飞廉和恶来出去监造离宫别馆，还让恶来替自己监视大臣诸侯的言行。

费仲和飞廉、恶来父子为报答“知遇之恩”，都尽心竭力为纣王服务：费仲发挥敛财技能，大肆搜刮民财，让纣王不用担心军费和王室开销问题。飞廉、恶来父子则做起了“恶监工”，严酷监督劳工，把纣王的宫室修建得富丽堂皇；而且恶来也没忘监视朝臣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在纣王面前打小报告。

当然，费仲和飞廉父子的勇力也是纣王非常欣赏的。上节介绍过，甲骨文卜辞里有皐族征“人方”（东夷的一支）的记录，那就是纣王十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纣王亲征东夷，耗时达二百多天，经过的重要地点有 50 多处，规模十分浩大。这样大规模的战事，纣王不可能不带上驾前的费仲和飞廉、恶来父子这三个嬴姓猛将。纣王时期卜辞中参与征人方的皐族，应该就是指费仲所率领的费国军队。

纣王十年的这次战争，只是纣王时期对东夷发动的所有战争中规模较大，而且保留信息也最完整的一次。金文和卜辞中还有纣王十五

年、纣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商人征伐东夷的记录。纣王这本钱没白下，他对东夷的战争，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成果。考古证明，晚商时期的商文化遗址，从商朝中期的山东济南、泗水、滕州一线，推进到山东潍河和沂河一线。而岳石文化分布区即东夷人的地盘则缩小到大致只剩下今天的胶东半岛和鲁东南沿海一带了。因此近现代以来，毛泽东和郭沫若等人，都曾从开拓东南、民族融合角度，大赞纣王征东夷的丰功伟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费仲和飞廉、恶来等嬴族人也算做了一些好事。

不过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纣王对东夷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因为一打常常就是经年，不能不严重消耗国力人力。众所周知，打仗就是打人打钱打物资。为了维持长期战争，纣王只有进一步横征暴敛，这又加剧了王朝内部矛盾和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而为了稳定新征服地区，商朝还要留驻兵力，迁徙商民到当地驻守乃至屯田。1963年，考古学家在鲁苏两省交界处山东一侧的苍山县，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上面带有商朝贵族的族徽“𪛗”。一些史学家认为，这“𪛗”就是纣王二十年征伐东夷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留驻此地镇守的商人将领。因此纣王在东夷的开拓活动，势必会进一步分散商王朝的军力。所以在史籍《左传》中，一直有商纣王征伐东夷导致后来亡国的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意思是纣王对东夷的胜利，赢了战争，却掏空了国家，导致了日后的灭亡。

见纣王越来越不上道，大臣们怨声载道，一些诸侯甚至开始反叛。强势的纣王不思悔改，而是加重刑罚，祭出了“炮烙之刑”，也就是把他讨厌的人抓起来，逼他在火中的铜柱上漫步，结果当然是脚底板被烧焦，人跌进火里活活被烧死。此后百官诸侯敢怒不敢言，越发与商纣王离心离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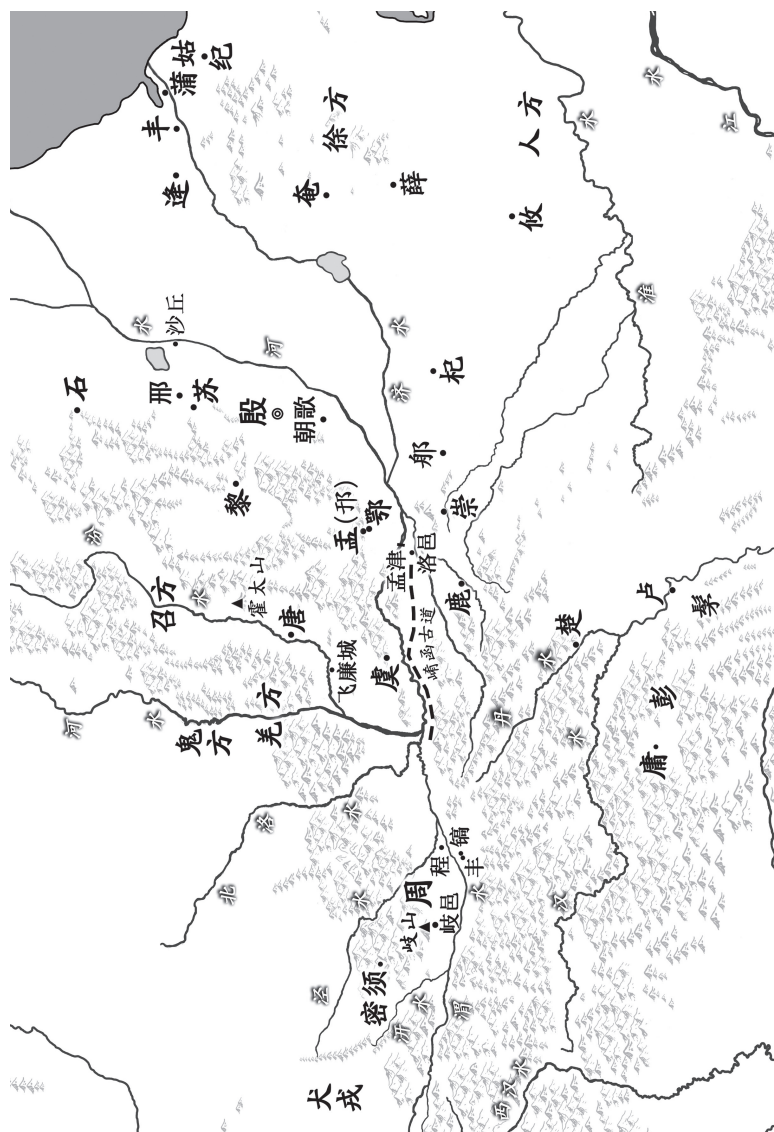
纣王执政十余年后，朝中又出了大事：纣王因为嫌他的一个妃子即鬼侯的女儿不会搔首弄姿取悦自己，就把她杀了，还顺带把她的父

亲鬼侯也杀了，并剁成了肉酱。鄂侯知道后，极为愤怒，跑去当面替鬼侯父女喊冤，言辞激烈，纣王一瞪眼把鄂侯也宰了，并做成了肉干。周侯昌听说后，就没敢吭声，据说只是叹了口气，但就这样还是被纣王驾前的另一宠臣崇侯虎打了小报告。纣王于是把来朝的周昌扣下软禁在安阳南边不远的羑里城，一关就是七年。

听说国君被商朝扣押，周国上下急得团团转。《史记》有载，周国的大臣闳夭、散宜生等人各方奔走，搜罗了无数珍宝美女，然后贿赂爱财的费仲，通过他去献给纣王，请求赎回自家主子。另据 20 世纪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一文记载，当时有九个诸侯反叛商朝，被关在羑里的周昌借机向纣王大表忠心，说能替纣王扫平叛乱。于是收了珍宝、美女的纣王大手一挥，把周昌放出羑里城，并赐予他象征军权的弓矢斧钺，任命他为西伯，让他为商朝讨伐叛乱九邦。这里纣王自以为算盘打得很精：反正周昌打九国无论谁胜，反商势力都将会遭到削弱，当然如果两败俱伤那是最妙的了！

话说这周昌，就是大禹治水时伯益的搭档后稷的后代。周人是和夏人有密切关系的西北部族，所以经常自称“有夏”。在周昌的祖父公亶父（后被周人追封为“太王”）时期，原本弱小落后的他们从豳地（今陕西彬县）迁徙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战略上又相对安全的宝地周原岐邑（今陕西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并与姜姓部族联姻，自那以后实力开始迅速发展。周昌的父亲季历东征西讨，将周人的影响力一直扩大到今天山西省境内，因此受到商王文丁（纣王爷爷）的猜忌，被文丁囚禁在库寨（地名）而死。周昌继位后，一度兴兵伐商报仇，却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韬光养晦，重新臣服于商朝。不过暗地里，周昌一直不忘大仇、招揽贤士、收买人心，为将来做打算。

这次周昌被纣王放回国后，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灭掉商朝。不久他编造神话自称接受了“天命”，开始私下里称王，



图势开米窗

这一年就被周人算作“受命元年”。随后已经升级为“周文王”的周昌，一方面继续对纣王表示恭顺，一方面大事扩军，组建起总共六个师（长官称“师氏”）、每师两千五百人的部队（当然也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兵制”），并任命著名的姜太公吕尚为“太师”，也即武装部队总司令。接下来周文王打着为商朝平叛的旗号，先后出兵征伐或灭掉了犬戎、密须、丰、镐、邠、石、邶、鹿、黎、崇等多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联络江汉地区的诸侯方国，与他们缔结同盟。通过战争和盟会，周国的影响力逐步达到天下的三分之二。而这时纣王却仍不醒悟，依旧迷信自己“有命在天”。

不过在文王五十年也即文王“受命九年”这年，已经基本为周国做好灭商准备的周文王却驾鹤西去，没能亲眼看到报仇雪恨的那一天。因长子伯邑考早夭，文王逝世后由他的二儿子太子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武王上台后，继续励精图治，进一步积蓄力量，准备完成父亲灭商兴周的遗志。

牧野之战与费仲、恶来之死

就在周人积极准备灭商的当口，商朝的天灾人祸也更加严重：气候越发干旱，黄河水一度枯竭，还暴发蝗灾；内部矛盾越发激化，纣王挖了叔父比干的心，囚禁了另一叔父（一说庶兄）箕子，商朝掌管音乐的官员太师疵和少师强带了乐器投奔了周国。

周武王觉着时机已到，于是决定趁商朝大批军队仍被牵制在东夷之际，一举灭商。

受命十年（武王即位未改元）年底，周武王率领周国大军开拔，

经天险崤函古道向东进发。因为当时处于“邑制国家”阶段，商朝包括各国只有属邑而没有领土的概念，当然也没有在险要处设关防守的意识，所以周军才能顺利通过。

不久武王大军来到今天黄河南岸的孟津，与应邀而来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军队会师。

伐商联军一共多少人呢？《史记》记载，周军有战车三百辆、虎贲（精锐敢死之士）三千人，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而其他各路盟军，共有战车四千辆。其实《史记》的数字绝对是夸张的，因为上古均是小国寡民，当时的周国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总人口最多不过十来万，怎么可能出动四万八千人的兵力？其实按战国兵书《司马法》中每辆战车配备甲士、步卒、役夫三十人的说法，伐商周军的总兵力应该在万人左右，这也与周国拥有六个师兵力的古籍记载相符合。至于其他各国联军，如果真有四千辆战车，该有十二万人了，但在商末这绝对不可能，因为殷墟卜辞显示，大国商朝一次出兵最多的记载不过是一万三千人，常见出兵规模也就是三五千人而已。鉴于来参加伐商的其他各国都是周国的小兄弟，出兵数字必然比周国少得多，所以每国出的数量可能也就是一两千人的规模罢了。这样算下来，伐商联军的总数为两三万人的样子。

伐商联军在孟津集结完毕，周武王作为联军统帅进行了一次盛大阅兵，并做了战前鼓动演说，这就是《尚书》中的《太誓》篇。阅兵式结束后，联军乘船渡过黄河，一路向商纣王居住的商朝别都朝歌（在

今河南淇县)杀去^①。受命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伐商联军抵达朝歌城外的郊野,冒雨布阵。因为朝歌又称“沫”或“牧”,所以史书把朝歌的郊野称为“牧野”,这次大战也被命名为“牧野之战”。

朝歌城里的纣王,在伐商联军渡河时就得到了消息,所以他并不惊慌。联军在朝歌城外布阵的同时,纣王也带领已经升任执政大臣的费仲等朝臣,在联军对面布阵。《诗经》有云,“殷商之旅,其会(通“旂”,kuài)如林”。意思是说商朝的军队密密麻麻,军旗招展像茂盛的森林。

《史记》则记载,纣王率领的大军有七十万人。不过这数字实在太惊人,所以自古以来大家一致认为是太史公把“七”和“十”的次序弄颠倒了,也即认为他是把“十七万”错写成了“七十万”。其实就是十七万军队,商纣王应该也拿不出来,因为前面说过,卜辞里商人一次用兵的最高数字不过才一万三千,而且历史学家宋镇豪研究认为,帝乙、帝辛时期殷墟总人口只有二十三万人上下^②。当然因为各种史书都说牧野之战中商军是远远多过伐商联军的,所以纣王拼凑出的兵力应该是联军的数倍,很可能是五六万人的样子(按殷墟有十一万名男子再去掉老弱病残来计算)。

在上古时代,双方集合了近十万人会战,已经算是惊天大战了!双方摆好阵势后,各自誓师提升士气,时间就已经到二月二十二甲子日的清晨时分,细雨早已经停了,耀眼的岁星(木星)还停留在天际。这时远道而来的联军一方率先发动了试探性攻击:武王命令太师吕尚

① 传统上多根据《史记》记载,认为孟津誓师后周武王以伐商时机尚未成熟为由罢兵返国,两年后才再次联合诸侯自孟津渡河伐商,继而发生牧野之战。但这种说法不见于先秦古籍,有违《太誓》的文意,也不符合战争逻辑和历史形势,因此本书赞同苏德荣论文《武王伐纣不存在孟津观兵之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的观点,认为周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之事只有一次,随后立即渡河打响牧野之战,不存在“二次伐商”之说。(详见拙作《简说西周史》第25节“子虚乌有的‘孟津观兵’”。)

② 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和一位百夫长率领百名骁勇战士直冲商军大阵。此举一来是为了显示周人的勇武，提振联军的士气，二来更是在寻找商军阵势的薄弱点。

历史上真实的姜太公吕尚，可不是《封神演义》里仙风道骨的军师，而是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猛将。他率领百余名精兵锐卒，像盘旋的雄鹰般冲向商军，用《诗经》里的原话来说就是“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经验丰富的吕尚一下子就找到商军阵势的“软肋”，并很快在那里冲出一个口子来。周武王见一击得手，迅速下令联军往吕尚撕开的这个口子突进。

那边纣王也是身经百战并胜多败少的马上君王，何况这次他的军力远多过对方，又是以逸待劳，所以他并不着慌。纣王在后方从容应对，指挥商军加强吕尚冲击部位的防御力量。一时间，两军的战斗仿佛要陷入胶着状态。谁知就在此时，商军阵内的大批士兵突然调转矛头，向纣王所在的中军位置杀了过来！这就是古书中所说的“纣卒易向”。纣王和执政大臣费仲见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当代的一些史学家，都说这些倒戈的士兵是商朝攻打东夷时俘虏来的夷人奴隶，因为朝歌兵力不足，所以纣王临时把他们派上了战场。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依据，只不过是“阶级史观”下的一种臆想，因为在上古奴隶是没有当兵资格的，商纣王当时的军力也超过联军，没必要武装奴隶。其实《吕氏春秋》对此记载得很明白：周人早已经与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以及商朝大臣胶鬲接上头，并积极拉拢他们与周人结成了反纣王联盟；在联军渡过黄河后，武王还与明面上以纣王使臣身份前来探师的胶鬲约定了“甲子日”这个大战的日期。所以牧野之战中部分商军临阵倒戈，完全是微子启和胶鬲暗中策反了部分反纣王的殷商旧贵族的结果。那他们为什么要帮周人打纣王呢？我们知道，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他应该是不满纣王排斥旧贵族而任用地位低下的“小人”的用人制度，尤其是不满自己作为兄

长没能继承王位，才勾结周人；至于胶鬲，不知是他本就是周人打入商朝的间谍，还是他不满纣王对自己不够重视。

虽有大批商军倒戈帮助周人，但俗话说得好，“秦桧还有仨好朋友”，纣王的禁卫军和费仲等被纣王提拔重用的大臣及其族军，依旧聚拢在纣王周围拼死战斗。双方杀得是天昏地暗，牧野沟壑里积存的雨水，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战死士兵手中的棍棒，都漂浮在血水之上。这种惨烈景象，就是古书所说的“血流漂杵”。

不过由于部分商军的叛变破坏了商军军阵的整体性，再加上以周人为首的联军不间断地发起猛烈攻势，战至午后时分，纣王和他的亲信们逐渐支撑不住。待到下午，纣王一方彻底崩溃，费仲等纣王亲信大臣被联军俘虏，只有纣王自己逃出战场，退回了朝歌城中。

眼见大势已去、逃跑无望，夜幕降临后纣王在朝歌王宫内的鹿台上抱着大批美玉自焚而死。另一边，胜利者武王则在微子启等倒戈的商朝旧贵族的欢迎下入城。

武王进了王宫，找到纣王的尸身向其射了三箭，又用轻吕剑捅了几下，最后用青铜大钺把纣王的头砍了下来，挂在太白军旗上；随后他又找到妲己等纣王两个妃子的尸体，也是箭射、剑捅其尸身，最后把她们脑袋砍下来挂在小白军旗上。做完这一切，武王才退回城外的联军大营中。

有人可能会问，费仲在牧野之战中与纣王并肩作战并最终战败被俘，那同样受纣王宠信的飞廉、恶来这爷俩，怎么没有出现在战斗里？难道是他们太不讲义气提前逃走了？您还别说，事情真不是这样子：原来飞廉在战前接受纣王的命令出使北方的亲商诸侯国，牧野之战时不在商王畿内；至于恶来，《逸周书》记载牧野大战后两天内，有一股叫“方来”的亲商势力曾向周军发动大规模反扑，结果被周武王派出的太师吕尚击败，很多学者认为“方来”就是“恶来”的讹误。所以飞廉、恶来这爷俩并不是不报纣王的“知遇之恩”，而是一个确

实出使在外，一个则在纣王自焚后仍主动攻击周军，不过战败被周人俘虏。

牧野之战后第四天，也即二月二十六日，武王一面派出将领继续在商王畿内外扫荡不臣服的商朝残余势力（先后攻灭 99 国、征服 652 国），一面带领周公旦、毕公高、召公奭（shì）、太师吕尚等兄弟和重臣，进入朝歌城商王宫社庙（祭祀土地之庙），举行了“革命大典”，正式宣布周朝取代商朝拥有天下。随后周武王“兴灭继绝”，命商朝王子禄父（后来日名为“武庚”）继续奉守殷商的祭祀，并将原商王畿主体地区和大部分商人遗民封给他。当然为了加以监控，他同时还命令自己的三弟管叔鲜、五弟蔡叔度、八弟霍叔处带兵留驻原商王畿一带，以“辅佐”禄父。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这三人就是周初著名的“三监”。

又过了几天，武王命令主管祭祀的宗祝官在军中设酒宴大宴四方宾客，并祭奠阵亡将士的亡灵，然后撤兵西归。

四月上旬，武王率领群臣、带着大批殷人战俘和海量的战利品，回到周人宗庙所在的岐邑。接下来六天内，他进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告庙祭祀活动。在第一天的“燎祭”仪式中，周人把纣王和他两个宠妃的头颅放在柴堆上焚烧，用袅袅上升的烟气来祭告周人先公先王；第四天，以费仲、恶来为首的百余名商纣王亲信大臣，也被周人杀死当做人牲献祭给周庙；尤其是第三天和第四天，周武王还分封了天下诸侯、方伯，标志他代替商王正式成为天下之主。

不过在此笔者想补充几句的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商末周初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周人书写的，失败了的商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其实应该没有《史记》等书上记载的那么坏，疑古派大家顾颉刚老先生曾经写过考据文章，证明纣王身上的坏事和荒唐事是后世逐步添加上的。在最古老的《尚书》里，周人声讨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收留任用小人、听信

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六条。近现代的多位历史学者，也对纣王开拓东夷的功绩给予了较高评价。既然真实的纣王没有传说的那么昏暴，那么费仲、恶来等人是不是像《史记》等书描写的那么小人，也要打一个问号了。退一步讲，他们就算不是好人，但至少还是比较符合旧道德的，那就是他们在最后时刻仍为纣王奋战不止，称得上是纣王的“忠臣”了。

且说飞廉结束出使任务从北方返回，路途中突然传来一连串惊天消息，宛如霹雳般在他耳边炸响：周武王纠集联军突袭中原，纣王战败自焚于鹿台，商朝已经灭亡！没几天后他又听说，周武王立了王子禄父做了商人新君，并派几位弟弟率军驻扎在商王畿内加以监视；周武王自己已经带着周军主力和大批商人战俘返回周原，战俘里有自己儿子恶来和同姓费仲在内的纣王亲信大臣百余人！

没想到自己外出公干没多久，天居然变了——国破了、君没了，儿子也沦为敌人的阶下囚，凶多吉少！飞廉震惊、悲痛、愤恨，但却什么也改变不了了。缓过神来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面前——他该回哪儿？

本来如果上面的事情都没发生，他是应该回到朝歌城向纣王汇报出使情况的；但现在纣王已经死了，朝歌城周围还有几位周国王弟带兵驻扎，自己作为纣王驾前排得上号的宠臣，出现在那里肯定是要被捉拿问罪的。飞廉思前想后，决定先潜回自家封地西垂避避风头。

《史记》记载，飞廉回到封地后仍不忘臣节：他在霍太山中筑起一座神坛，招引纣王的魂灵进行祭祀，并郑重其事地向其汇报自己出使的经历和结果。在这当口，又发生了一件神异的事情——在筑坛动土的过程中，一副神秘的石棺显露出来，石棺上还刻着字，内容为“帝令处父（飞廉的字）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上帝命令处父不得参与殷商之乱，特赐你石棺来为家族增光添彩）。等飞廉死后，他就被放入石棺葬在霍太山。

不过《史记》所讲的石棺故事显然神话味太浓了，而且不符合情理：忠心商纣且失去儿子的飞廉，怎么能不向周人报国仇、雪子恨，就甘心这么死了呢？与《史记》记载不同，《孟子》一书和 21 世纪新

2008 年，清华大学从海外回收一批战国中后期竹简，竹简共约 2500 枚，内容主要为《尚书》逸篇，还包括诗歌、史书、巫祝书等各类型文献。该批竹简在秦朝建立前被埋葬，躲过“焚书”，保留了先秦古籍的原貌，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

出世的清华简《系年》都言，飞廉后来是因参与了反周叛乱而被周人杀死在东海边的。所以真实的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飞廉得石棺、死葬霍太山的桥段，当时他应该是躲在霍太山中厉兵秣马、紧盯天下局势，最终参加了所谓的反周“殷乱”而死的。《史记》之所以记载飞廉“不与殷乱”，很可能是进入周代以后飞廉后裔的秦人为了掩盖自己祖上曾经积极反周的尴尬事实而编造了谎言，这谎言又在秦朝建立后被定为“官方唯一说法”，最终在太史公写《史记》时被收录进书中。

那么飞廉参加的反周叛乱具体情形如何，他又是如何死在霍太山以东数千里的东海边的呢？且看下一节。

三监叛乱 飞廉殉商

要说西周初年的反周“殷乱”，其实还得从“周公摄政”说起。

话说因为多年操劳，周武王灭商第二年就得了重病。当时周朝刚刚建立，根基尚未稳固，开国君主却倒下了，周人不由得十分恐慌。

为了给二哥续命，四弟周公旦私下里主动举行了禳除灾祸的

“禋（yíng）祭”，向上天请求由自己代替二哥去死。不知是不是凑巧，这次祭后武王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不过没等大家高兴多久，当年年底武王病情再度复发，最终不治离世。

武王驾崩后，年仅十三岁（古人年龄均按虚岁计算）的太子诵继位为王，这就是周成王。因为成王年幼，出于稳定大局的想法，他的四叔周公旦自告奋勇担任了王朝摄政，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政。

可周公旦的行为却引起朝廷内外很多势力的不满。在朝内担任太保（职责为保育君王、监察百官）一职的召公奭和担任太师一职的姜太公吕尚（他是成王外公），因为与成王的亲近关系，对周公旦架空成王的做法浮想联翩。在原商王畿负责监视并镇抚东方的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三监”，对周公旦做摄政更是极为嫉妒。尤其是那老三管叔鲜，认为按排行算，二哥武王发去世后也该由他执政而轮不到老四周公旦。因此他们大肆散播流言，说周公旦摄政独揽大权，恐怕有篡逆之心，将会对小成王不利。闹到后来，小成王本人也对四叔周公旦起了疑心，开始对他加以防范。

摄政摄出这样的结局，周公旦不由得傻了眼。他多次试着向朝中大臣以及王兄王弟们解释自己的本心，但是却丝毫没能消除他们的敌意。无奈之下，周公旦只得用行动证明自己——他辞去了摄政的职务，离开权力中心避居东方，以求得周人自身的团结。

古往今来，唯放弃到手的权力最是难能可贵。召公奭和太师吕尚见周公旦居然拱手让权，慢慢消除了对他的误解。可当事人小成王却仍旧没有理解四叔。

据《尚书·金縢》记载，周公旦避居东方的第二年秋天，镐京一带狂风暴雨大作，地里庄稼全部被吹倒，甚至很多粗壮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周人不由得大为恐慌。于是成王和众大臣郑重地穿起朝服，来到朝廷档案室查看旧档，看看是否是办了什么错事、制造了什么冤假错案，才惹得老天爷如此发怒。这一查，就把当年周公旦私下举行禋

祭时的祷告祝词，从一个用金线封起的石头匣子中找了出来。成王得知四叔周公旦曾请求天帝和祖先，由他代替武王去死，不由得大为感动，继而十分后悔。他当即下令，派人去东方请四叔周公旦回朝。而周公旦因为获得了成王的信任，重新执掌了大权。

过去评书常说，“话分两头，各表一枝”。现在我们再调过头来讲讲东方的情形。

本来周武王灭商，就是趁着商朝内部矛盾重重、商军部分兵力被牵制在东夷，才实现以小灭大、以落后战胜先进的（周人原本无文字也不会制作青铜礼器），因此亡国的殷人难免心中极不服气。所以武王一去世，那些饱含亡国之恨的殷商贵族遗民就像过了狂欢节一般。

紧接着商人又得到消息，周公旦扶立小成王继位后自行摄政专权，遭到上下一致的怀疑，尤其是负责监督他们的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更是极为不满。于是原商朝东部的诸侯国奄国（在今山东曲阜东部）、蒲姑国（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的国君，就撺掇武王新立的商人之主禄父说：“现在周武王死了，周人新君还是个小屁孩，周公摄政又被内外怀疑，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复国良机啊！我们赶快起兵吧！”

禄父作为商朝王室贵族，不可能对商人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没有悲痛之心，更不可能心甘情愿做周人三监监视下的傀儡。现在得到两位国君的支持，他内心中潜藏的“恢复大商”的雄心壮志被激发起来。只不过禄父忌惮三监手中的兵力，一时弄不清他们的态度，所以还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管、蔡、霍这三监，他们的态度确实是变化不定：最初他们当然是因周公旦摄政而怒气冲天，不过看到周公旦被迫还政隐退后，他们的心里平衡了很多——虽然我们没坐上摄政的位子，但你老四也没坐成啊！可不久因“金縢”被发现，周公旦重新担任了摄政。得知他再次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管、蔡、霍这哥仨心中的嫉妒与恨又爆发了，他们最终把亲情、把周武王交给他们的镇守东方的重任抛在脑

后，决定与镐京朝廷翻脸，武力夺取最高权力，由自己来当家。

这时管、蔡、霍想篡权，那边禄父想复商，两家在反对镐京朝廷方面达成了一致，于是联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跟他们一同反叛镐京西周朝廷的，还有东方的东国、徐国、奄国、蒲姑国、丰国（今山东高青县）以及其他一些熊姓、盈（通“赢”）姓的东夷小国。据孟子说，这些反周的诸侯方国加在一块儿总共有五十余国，甚至连西方都有国家响应叛乱，如位于今天山西南部的祁姓唐国。

东方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周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垂的飞廉耳朵里，他自然是欣喜若狂——隐忍几年，没想到真的等来了为旧主纣王和儿子恶来报仇雪恨的机会！于是他带领族军开出霍太山，一路向朝歌进发。现在的他，已经把忠心转移到商人新君禄父身上，所以他决定要投身禄父麾下继续为商朝效命。

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这三监和商君禄父一起造反，而且原商朝数十诸侯国一起响应，西周王朝立即塌了半边天。消息传到镐京后，周人震惊不已。因为管、蔡、霍这哥仨手中掌握着在东方震慑商人的周朝精锐军队，再加上禄父手中的殷商军队以及东夷势力，叛军军事实力实在是非常庞大。

面对人心动摇，辅政的周公旦临危不惧，以成王的口吻写了一篇文告，强调平叛的必要性，鼓舞周人的战斗信心，这就是《尚书》中的《大诰》。周成王二年秋，周公旦作为三军统帅，集结西周大军，踏上了东征的路程。如果把他随武王伐纣的那次算作第一次东征的话，那这一次显然就是第二次了。

当时，管、蔡、霍这三监正带兵西进，准备攻击周朝规划中的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此周公旦的东征大军首先在洛邑以东地区与管、蔡、霍的叛军交战。虽然史书没有明确提及，但按照正常的思维，周公旦在两军交战前，肯定会秘密派出大量说客或间谍到三叔的军营中去，用“同宗之情、叛国之耻”来教育并分化瓦解他们的

部下。所以面对周公旦率领的朝廷征讨大军，三叔统辖的周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兵败后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仓皇北渡黄河，逃往盟友禄父那里。周公旦则指挥东征大军乘胜追击，又渡河攻击朝歌一带的禄父商军。《逸周书》称，周公大军“临卫征殷”。这个“卫”地在朝歌城东10公里左右，因此这一仗周公旦应是率军迂回到禄父商军的后面，首先截断了他与东夷诸国的联系以及东逃的退路。禄父没有料到周公旦会如此用兵，再加上周公旦有“第五纵队”——商人的十个大贵族相助，陷入恐慌中的禄父商军不久也全线溃败，史书称“殷大震溃”。

禄父虽然打仗不行，逃跑的功夫倒是一流。他见势不妙，立即拔腿就往有商人统治基础的北方逃窜。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商人就是起源于河北或辽西的，而且当时孤竹国、箕子朝鲜等商人诸侯国都在北方。

对于禄父这个在商人遗民中有着极大号召力的旗帜般人物，周人当然是万万不能放过的。据西周青铜器太保簋铭文记载，禄父战败北逃后，成王立即命令太保召公奭率领一支大军追杀他。虽然有商人遗民的掩护，但穷追不舍的召公奭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挖出了北逃的禄父，将他斩杀。禄父死后，被商人遗民上了一个“武庚”的日名，其家族则投降了周人。而召公奭的儿子克从此驻守在北疆也就是今天北京附近，后来被封为诸侯，这就是周代姬姓北燕国的由来（周代另有姑姓南燕国），当然北燕国名义上的始封君是召公奭。在此再强调一下，周代北燕国的国号，在两周金文里都是写作“匱”或“郾”的，从不写作“燕”，是汉代以后将该国国名写为通假字“燕”，一通假就通假了两千年，本字反而罕有人知晓。因为约定俗成，本书下面也不再纠正。

禄父有本族人掩护，还多逃得了几天性命，但人生地不熟的三监就没那么走运了。管叔鲜知道自己是“首犯”罪无可赦，又羞于被弟

弟周公旦俘虏，于是抹脖子自杀了。管叔鲜死后，管国也被取消，后来其子孙流散各地。据一些古籍记载，春秋时齐国名相管仲就是管叔之后。蔡叔度和霍叔处则被东征的周军抓获，前者被流放，后者被废为庶人，好在他们的封国蔡国和霍国被保留了下来。为了统治殷商故地，周公旦让自己信任的九弟康叔封留驻当地镇守，后来康叔封被封为诸侯，这就是周代卫国的来历。

禄父战败时，他的部下四处溃散。见大势已去，飞廉也无能为力，只有在乱军中竭力收拢族人。逃出朝歌很远后，见一时摆脱了周人追兵，飞廉一行停下来略作喘息。沮丧之余，又一个迫切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现在该往何处去呢？飞廉招来小儿子季胜和部将商议，众人最终决定向东走，投奔奄国去。动身之后，他们在路上又陆续碰到很多商人溃兵或亲商氏族，于是结伴而行。

不过包括飞廉在内的殷商遗民，为什么大都选择逃往东方的奄国呢？有读者可能记得，前面我们曾经介绍，商人自成汤灭夏之后曾经五次迁都，其中第四次就迁都到奄城——第十八任商王南庚从邢地迁都于此，第十九任商王阳甲继续定都于奄，直到第二十任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其间奄城共做了商朝数十年国都。

作为原商朝旧都所在的奄国，国力强大，城高池深，奄国国君又对商朝非常忠诚，当初率先力劝禄父造反复国。因此那些群龙无首但仍不愿投降周人的殷商顽民，大多就选择退守奄国来再次对抗周人。我们前面还提及，纣王当年征东夷时留下不少兵力在当地驻守。这些留驻东夷地区的商军，很可能也汇聚到了奄国周围。

那边周公旦得知殷商顽民溃兵又汇集在奄国后，采取大臣辛甲大夫的建议，决定采取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再攻取坚城的策略。东征的周军，于是兵分南北两路分进合击。

北路周军得到的命令是攻打位于今天山东北部的蒲姑国（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和丰国（今山东高青县）。这蒲姑国，也是东夷系统

中一个较强的国家。但北路周军是由周朝猛将太师吕尚统率的，所以两国虽然激烈抵抗，最终还是被灭，其君主都被周军抓住杀了头。后来周朝将太师吕尚封在蒲姑国旧地，国号齐，这就是姜姓齐国的由来。

南路周军进攻位于现在鲁南、苏北一带，以徐国为首的一帮盈（嬴）姓、熊姓东夷小国。这徐国，周代青铜器里写作“余”或“郯”，传说同样是伯益次子若木（费氏）的后代，当时大概位于奄国（在今山东曲阜以东）的东南方，也是东夷盈（嬴）姓国中势力较大的一支。但在周公旦东征大军的凌厉攻势下，徐国和附近的其他熊姓、盈（嬴）姓小国，或是投降，或是逃散。那时东夷地区，很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很多东夷小国也还处于游牧或渔猎的状态。据孟子他老人家讲，周军为了搜索那些密林中的反周夷人，深入险阻，甚至把虎、豹、犀牛、大象等野兽都惊得四散逃跑。

南北方向的敌人都平定后，周公旦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城池坚固的强大奄国。已经斩杀禄父（武庚）的召公奭，也率领所部从北方赶来助战。为了鼓舞周军士气，目睹最后的胜利，少年天子成王更是御驾亲临。

果然，成王的到来让前线周军士气大振。随后周人东征大军对奄国发动了盛大的攻势。当时在周王室中担任太祝一职、掌管祭祀事务的周公嫡长子伯禽，在战斗中表现尤其英勇。

奄军和飞廉等族的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是因为听说其他各国都被周人平定，奄城已经成为一座孤城，他们的士气逐渐低落。

眼见周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城内的粮草和箭矢、滚木礮石都要用尽，奄国国君终于失去了继续抵抗的勇气，偷偷和周人接洽要求投降，周人于是拿下了这个东方最大的反周堡垒。战后，成王命周公嫡长子伯禽镇守奄国旧地，后来朝廷将该地封给周公旦，不过周公旦公务繁忙无法就封，所以实际就封的是伯禽，这就是周代鲁国的由来。

但奄君投降后，忠于殷商的飞廉仍不向周人低头，他率残部突出

周人的包围圈继续东逃，决心与周人周旋到底。周公旦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派出一支周军对飞廉紧追不舍，最终在东海边追上他。背靠大海、无路可走的飞廉誓死不降，犹自挥戈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殉商。包括飞廉小儿子季胜在内的飞廉族人，也尽数被周军俘虏。就这样，原本在商朝颇为显赫的飞廉一族，如今却成为亡国的阶下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大秦帝国全史



大秦帝国全史

唐封叶

来自微信读书



重庆出版社 推荐

